



【编者的话】

“就一般人来说，对儿子的慈爱，对父亲的孝心和对妻子的恩爱，会促使长期在外漂流的人急于回家，但是在尤利西斯心中，认识世界的欲望远比这种感情强烈，以至于促使他不肯还乡与家人团聚，而毅然决裂地冒险远航去阅历‘太阳背后的无人的世界’。”

田德望先生对尤利西斯的这番叙述揭示了个人与故乡之间充满张力的关系。蛇年春节前的最后一期一五十一十周刊，我们谈谈个体与故乡。

老愚和李海鹏的两篇文章为我们讲述了他们记忆中的故乡。老愚回忆了自己幼时在故乡的经历，当戛然而止的童年走向消逝之时，他发现：人们所说的那个故乡，其实只在童年里。“故乡”，就是逝去的、永不再来的那个东西。与李海鹏相似，李海鹏的故乡占据了他童年记忆的大部分章节。在李海鹏看似平淡的对往事的追溯之中，我们看到，故乡是个人，甚至是整个家族记忆的源泉。

对于李海鹏和老愚来说，故乡是他们是亲历过、生活过的土地，是切实的乡音和泥土气息。然而，对于如今漂泊在外的异乡人，故乡变成了自我通过文字和残存的记忆构建起来的地方，个人与故乡之间已经不再是那种共同生长起来的紧密联系，而更像是在语言的间隙之间挣扎着的充满幻觉的乡愁。

正如北岛在解释自己的诗作《黑色地图》时所说：“地图是确定方位的工具，但黑色又是一种屏蔽。回乡之旅又是迷失之旅，那个地理上的家早就不在了”，所以他要借着作家的身份，以文字重建一座北京城，重建“他自己的北京”。身处漂泊之境，汉语成为了北岛的故乡。用英语写作的哈金面临着更大的困境：“他算是一个华裔的英文作家？还是用英文写作的中国作家？属于时下席卷世界文坛的移民文学潮？还是生存于文化缝隙中的非母语作家？”这些身份之辨纠缠着哈金的写作，在这种情况下，故乡成了他创作的源泉。

许知远的文章《无根的丹青》则为我们讲述了陈丹青在某种意义上对故乡的“探寻”。2000年，在纽约城住了 18 年的陈丹青，最终还是决定回国。许知远的文章《无根的丹青》试图沿着陈丹青的个人生命历程，剖析异乡与故乡在他内心造成的冲突，试图回答，昔日的幽灵无时无刻不在，而吸引他回来的，是乡愁，还是又一次对现状的逃避——他厌倦了纽约局外人与旁观者的生活？故乡是文学的一个永恒主题，结合对于奈保尔《印度三部曲》的分析，评论家张柠认为，对于迫切想要找回故乡的奈保尔来说，故乡既是“被叙述的”和“想象中的”，也是“现实的”，对故乡的追寻、理解和表达就是一种特殊的“寻根”方式。

时代的变迁是个人无法阻挡的。当代诗人于坚在口述中表达了自己的无可奈何：身处一个从乡土中国向现代化中国转型的时代，我们抛弃了自己的故乡，不断地搬家，像灰尘一样被赶到了大地上，居无定所。熊培云与于坚有着类似的感受，在《谁人故乡不沦陷》一文中，他表达对于故乡沦陷的伤感：笼罩在普通中国人身上的最真实的黑暗与无奈，不是屠杀不是冤冤相报，而是权力和资本不断践踏与蚕食每个人的故乡。

在周刊的最后，王晓渔的文章《我没有乡愁》为我们提供了看待个人与故乡关系的另一种角度：故乡并不总是充满着无奈与悲情的色彩，或许太过浪漫化的故乡只适合想象，不适合返回。他认为，乡愁和文化有关，唤起内心文化记忆的地方才是有乡愁的地方，但是在如今的故乡身上，他只能看到凋敝。

春节将至，一五十一十周刊将休刊两期。祝各位读者新春愉快，我们 2 月 22 日再会。

一五十一十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十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 | |
|--------------------------------|----|
| 【编者的话】 | 1 |
| 【忆】 | 6 |
| 9-1 老愚：故乡在童年那头 | 6 |
| 9-2 李海鹏：消失的故乡：三百年去来 | 9 |
| 【漂】 | 16 |
| 9-3 周昂：北岛：城门开后 | 16 |
| 9-4 黄修毅：哈金：等待与回归 | 22 |
| 【寻】 | 33 |
| 9-5 许知远：无根的丹青 | 33 |
| 9-6 张柠：奈保尔：想象的故乡和《印度三部曲》 | 47 |
| 【现】 | 53 |
| 9-7 于坚：我们像灰尘一样被赶到了大地上 | 53 |
| 9-8 熊培云：谁人故乡不沦陷 | 57 |
| 9-9 王晓渔：我没有乡愁 | 62 |
| 【洞见专栏】 | 65 |
| 陶郁：进城务工农民定居意愿偏低 | 65 |
| 【FMN 新闻】 | 68 |
| 北京雾霾天气 | 68 |
| 重庆不雅视频 | 69 |
| “房姐”等拥有大量住房人士 | 71 |
| 本周其他重点新闻 | 73 |



[在 Facebook 分享本期周刊](#)



[在腾讯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 Twitter 分享本期周刊](#)



[在搜狐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饭否分享本期周刊](#)



[在人人网分享本期周刊](#)



[在新浪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在豆瓣分享本期周刊](#)



[在网易微博分享本期周刊](#)

【忆】

9-1 老愚：故乡在童年那头

“人们所说的那个故乡，其实只在童年里。当你找寻她时，就只剩下两个汉字了。‘故—乡’，就是逝去的、永不再来的那个东西。”



四岁睁开眼时，我很奇怪地注视着汤家村：这是我的家乡吗？

一些人从房子里胀出来，另一些人从土窑里鳊上来。鸡鸣狗叫，雀儿跳跃，树影罩住了村庄，把太阳挡在外面。我在爷爷背上睡着了，我觉得这些都很没意思。在我的世界里，只有三个人，爷爷，妈妈和我。母亲为人家做衣服，缝纫机发出的悦耳之音，回响在空旷的院子里。

起风了，黄狗呜呜叫唤，“哐当——”黑漆大门像是被醉汉推开了，雨斜着扫进来。屋顶上好看的青苔，皆弯腰让水顺着瓦楞流下来，“嘭嘭”掉在地上。一道道激越的水流，摔在地上，变成一串串水泡……摇曳着往地沟里奔去，一个个相继破碎，又焕然一新。我着迷于这种神奇的情景，不觉伸长了脖子。这时候，妈妈会轻声叮嘱：“进屋来吧，别淋了雨。”

父亲在遥远的边疆服役，不知过多少日子才寄回来一封薄信。母亲把信藏在柜子里，上了锁。

院子里种了一畦忘忧草，初夏开出数朵金灿灿的花儿。在我的记忆里，老有蜜蜂围着花儿绕圈子，它们不知在忙些什么。

一天中午，母亲还在收拾碗筷，一群男人突然闯进来，抬走了缝纫机。等母亲发现动静，大门已从外面箍死了。母亲晕倒在地，爷爷赶紧唤人来救。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母亲？

后来，听干爹说，他曾专程去宝鸡，费了很大周折，找到我的生父，劝阻他别离婚。但生父主意已定，不为所动。

母亲只好另做打算。设想过把我和妹妹送人，这样能嫁个好人家。但最后，她还是决心找一个能接受孩子的男人，“我们娘仨，死也要死在一起。”我长大后，外婆说，你母亲为你险些哭瞎了眼。

媒婆带着母亲，母亲拉着我的手，我们走进了邻村一户人家的院子。大人们说着话，我在院子里玩耍。一株丰腴的桃树，结满了好看的果子，我多想摘一颗桃尝尝。

吃完饭，经过那株桃树时，主人家婆婆摘了两颗桃塞进我口袋：“我娃，以后想吃就能吃了。”

五月天，蝉拉长声调叫唤，母亲低头扛着车子，上面放着我们的行李，妹妹坐在行李上，我在后面推着车。爷爷把我们送到村口那颗蓬勃的皂楠树下村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窄窄的土路上，也看不到人。在两村界河边，有一只羊埋头吃草。世界安静极了。

太阳刺眼，麦浪翻滚。车轱辘发出“吱吱吱吱”单调的声响，我知道这就是离别。爷爷，别了，老屋，别了。

风吹过来，扬起一阵黄尘。麦子快熟了，空气里逸出麦子的清香。

我们得吃新家打的粮食了。

继父送给我一副簇新的扑克牌，随手翻出一张，竟然是猩红的红桃 A，心不由一惊。

称呼族人，在我是一件窘迫的事情。因为在心里，我并未接受这个地方，这是继父的村庄，他们都跟他有关系，我是多余的，我的血缘关系在东边那个村庄。按辈分叫每一个大人，并把他们记在心里，于我而言，便是痛苦。我经常支使妹妹去借东西，母亲把这理解为我怕羞，多少年后，她还经常用这来作我幼年羞涩的证明。母亲，那不是羞涩。

两个村子仅有一里路之隔，我见到汤家村的人更加羞涩，好像自己见不得人似的。在学校里，经常有那个村的顽劣同学讥笑我：你妈结婚的时候，你还放炮呢！这是直指我痛处的话语，一下就要了我的命。

一天，因为拉风箱烧火时看连环画，继父踢了我一脚，我决心去死。

我躲进村北高台上的秸秆堆里，设计着自己的死法。我能想到的是，不吃不喝，睡在里面，直到饿死为止。我知道母亲会心痛得四处找我，而继父也会很不乐意地寻找，我害怕被他找到。

碾麦子的场上立着几十个秸秆堆，偷情男女常在此勾连，村里人打牌也在里面。他们铺好了麦草，把里面弄得很暖和，还留了透气孔和透光孔，嗅着植物的香味，在里面纵情叫喊——“大小王炸了你！”

我在里面躺了半天，迷迷糊糊竟然睡过去。等我醒来时，天已经黑下来，人家的炊烟浮动在村庄上空，不时有驱赶牲口的声音，“吁——吁，狗日的，走啊！”

我也饿了。我想母亲蒸的白面馍馍了。扒拉掉身上的秸秆丝，我往家里走去。

当我背起书包走进池塘边的小学校，童年便戛然而止。

曾经幻想，当我从外地归来，一切都不变化：我喜欢的女老师还是那样好看，也不嫁人；我的朋友还在野地里等着我去拔草，村里人不会老去，我的亲人不会死去。

人们所说的那个故乡，其实只在童年里。当你找寻她时，就只剩下两个汉字了。“故一乡”，就是逝去的、永不再来的那个东西。

谨以此纪念我们的童年。

（老愚，FT 中文网专栏作家，著有《在和风中假寐》等。

原文链接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8892?page=1>）

[【返回目录】](#)

9-2 李海鹏：消失的故乡：三百年去来

“当我在这里度过童年时，景致远不如今日密集。没有可看之处。没有这么多物。记忆中的张村是疏朗的，四处空空荡荡。合该用契诃夫的那种口吻描述当年景致，万事寻常而且必然，永远不必惊讶。”



前年夏天，姥姥病重，我回了一趟张村。初中时我随家人从这里搬到了城市边缘，立刻就对张村失去了兴趣，每次回来都只到村头舅舅家的楼房为止。二十多年前，这房子还在建造时，一个凉风习习的傍晚，我曾带着游客的目光注视着它巍峨的身影，被舅舅捉到楼顶去浇水。那是水泥预制板的保养工序。那时我站在楼顶，比世上的他人更接近暮色，第一次感觉到何为财富。那黑胶皮水管的汩汩歌声似乎至今仍萦绕耳际。如今舅舅家道殷实，在市区拥有多处房产，这里更像是个岁月的纪念馆。似乎忽然之间，身段灵活、忙个不停的姥姥已经行动不便，接近了生命尽头，我自己也到了人生的中途。就是在这一天，我终于迈开步子向村子里头走去，奇异感丝丝缕缕，那感觉就像电子游戏里的一名斥候驰往尚未探明的黑暗区域。

一切景物都很陌生。夏日午后。池塘。柳树。每户人家的围墙并没有像故地重游的人们常说的那样变矮，相反更形高大。昔日的土墙化身为将近两米高的砖墙，遮掩了神秘的院落。墙角下翠生生地摇曳着玉米、豆子和我不认识的作物，霸占了一半路面。如今的东北村落中有那么多块人工池塘，随处水光粼粼，也真让人吃惊。每块池塘边都有一条木头栈桥，桥头的机器兀自驱动着金属拨片，把饲料推进鱼塘，节拍器似地响动着。鱼群吮吸水面的声音有着几何般的秩序。除此之外，风在树梢，四无声息。仿佛故园风物犹存，张村的人却已经永远地离去了。

这般光景，不由得我不想起过去。我溜溜达达，再自然不过地，意识到自己也是历史中的人物。

当我在这里度过童年时，景致远不如今日密集。没有可看之处。没有这么多物。记忆中的张村是疏朗的，四处空空荡荡。合该用契诃夫的那种口吻描述当年景致，万事寻常而且必然，永远不必惊讶。

然而夏天仍是一个幸运的故事。对小孩子来说东北的冬天太冷了，你被冻结在空气里，无声哭泣。可是如果你是小孩子而且在夏天，那么你就是惟一幸运的人。在故事的开端，我还没上小学，初夏时在村子里闲逛，逮一种叫“苞米虫”的昆虫，用秸秆插进它肩胛骨的位置，就得到了一只生物电扇。那孩子不厌其烦地用它吹去额头上的汗珠。如果他去菜园，那么一定是去看浇水。抽水机嗡嗡响着，清冽的地下水喷涌而出，不疾不徐地跳过垄沟，水流鼓起筋肉，状似绳索，总是令人心旷神怡。正式的夏天是从吃豆角的那一天开始的。豆角炖猪肉，因为用铁锅，汤会发黑。然后是爷爷种的草莓，牙齿咬开果肉时有奶酪般的滑腻之感，可惜产量不丰，因土地本不该如此奢侈利用。盛夏，烈日当空，黄瓜不那么好吃了，可是西红柿正好。它的藤枝用布条绑在架子上。西红柿裂开了，像花朵，像伤口。秋天，它们把菜籽洒在地上，以为自然界无为而治，大有来年生根发芽的机会，全不知张村的人们已经接管了一切。白菜长成比较大颗的时候，热力减弱，宇宙间满是浓白的秋光，云朵澹澹，霜雪已在孕育。

河蚌在软泥中留下的痕迹。这形象，在脑中盘桓不去。我妈不逼我读书的时候，我就独自在张村里闲逛，常到一处天然池塘边看河蚌。池水浮漾着，草茎随之摇摇摆摆。我看到一片亮光，有点儿弯曲，也听到微风吹过，但是声音与动作并不同步。这是回忆。那时我把手伸到水里，水已晒暖。河蚌们聚集在一起，像一队耐心的老年人要走去代销点。我记得白色的蚌足像共产主义梦想一般伸展着，忽而泥沙一闪，已经缩回硬壳。往事，没有边缘，没有分界，不知所踪。

那是一个痛苦的村庄吗？我并不确切知道。当我明确了解何为痛苦的时候，我已经离开那里。毕竟那时我难以置信地年轻。我们到了新家，住在楼房里，享受城市的便利。很快我又陷入青春期的泥沼，对抗，纠结，无暇他顾。我对张村所知甚少。匮乏和封闭，显而易见，并不意外。但是内里如何，一片模糊。亲族是否和睦，农稼是否顺意，婚丧仪式是否令老人满足，民兵们是否讲究人情，甚或某个妇女在我七岁那年自杀究竟是何情状等等，大概没人可以清晰讲述。

文革结束时我几无记忆，只知道有条街道上的一棵树与之有关，某个叫什么“小二”的人被诬陷批斗，在这里吊死了。我的堂兄告诉我，当时是冬天，那人的舌头伸出老长，垂下了一条冰溜子。每当我不得不路过这棵树时都吓得魂飞魄散。我认识“小二”的兄弟，在城里上班，穿毛料服装，看上去非常体面。他并没有随时表露悲伤，令我大惑不解。我差点儿告诉堂兄，如果他上吊了我绝不会这般无情。村里有两个疯子，其中一个非常高大，常歪歪斜斜地走在路上。哑巴也有，骂人时用猥亵的手势。他们都让张村富有神秘色彩。有的人家死了婴儿，在村外挖个浅坑埋下，孩子们就挖出来，拖着玩。每隔一段日子，生产队的一个人就拎着一只铁桶，在墙上刷上标语，“计划生育是我国基本国策”云云。最无知的孩子也熟知一套术语，从“结扎”到“劳动力”。上小学之后，村子变得更加不可思议，因为有一天老师带我们去了敬老院。我从来不知道村子边缘还有这样一个院子，就像一个流放地，里面藏着很多目光呆滞的老年人，散发着臭味。老师让我们给他们当中的朝鲜战争老兵敬礼。我们帮忙把敬老院的玻璃擦得雪亮，心中充溢着崇高感，又尝了尝爷爷奶奶们的食物，一个孩子吃吐了。

就像我在一本小说里写到的一个人物一样，我妈对这一切嗤之以鼻。她对少女时期的城市生活记忆犹新，不愿与张村同流合污，即便收入菲薄，也订阅报纸，还特意去城里的书店买书。我对唐诗、宋词的知识从未超过她。她是家族中科学、文艺、教育方面的专家，每个人都会请教她。但是一旦发生现实的冲突，没有人把她的意见当回事。她被看做是过分天真的。当她老了，已在市场经济的空隙中发财致富的二姨她们就带着宽容的微笑听她说话，像对待小孩子。我逐渐想起这种态度在中国是经典的：她什么都好，就是没什么用处。她是一个知识分子。

我记起蚌足如何缩回。我记得几个亲戚在我家的客厅——由于我妈的布尔乔亚坚持而耗资兴建——议论“包产到户”，一位表舅嘲弄地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回解放前。”然后他说，他欢迎这一变化，因为他有力气，愿意自己干，接下来他继续嘲弄。大概也是在那一时期，村里安装了电表，立刻就产生了偷电的人。他们用两根木杆，中间穿着铁丝，搭在室外的火线和零线上。很快就发生了火灾。我第一次见到了救火车，它在火焰熄灭一个小时后急匆匆赶到。那户人家的女主人坐在灰烬边大声哭泣。她就像我们张村每个人内心里愿意的那样无所顾忌地哭泣。

如今，我尽量把往事看做平凡无奇而安之若素。那时父母常吵架，势同水火。这几乎天经地义。夫妻本是一对死敌，也许这才是永恒的真相。当然我又提醒自己不必如此悲观。无论如何，在那个年代，和和气气的夫妇如同传奇。人总是不幸的。何必自欺欺人？父母也许恨小孩。

小孩诅咒父母死去。人是自私的，盛怒之下，无妨将痛苦施予他人。这就如同杨树的叶子会被夏天的太阳晒卷一样并不稀罕。幸福也有，倏忽而逝。一切恰如叔本华的话：生命就是在痛苦与倦怠间摇摆。在张村，在当年，各种认知、概念、感慨，在人的意识中不过萤虫之光。

在此之前，我曾去过一次黑龙江北部，那是七月，因为空气的凉爽，我在那儿想起了张村，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它何其荒蛮。我想起了稻田、青蛙。我想起了我为何畏惧蜥蜴。如果你打死蜥蜴的话，要在它周围画一个圈儿，表示锁住它，否则它的尾巴会抖动不停，那就是给蛇写信。蛇是蜥蜴的大哥，就像毛主席是华主席的大哥一样。我总是打死蜥蜴又担惊受怕，简直中了邪。有一年村里莫名其妙地来了很多猫头鹰。它们高踞在树上，审视着我们的平庸的生活，懒汉般在村里游荡了一些时日，又消失了。我怕乌鸦，因为它们不祥。喜鹊当然相反。我考上大学那一天，姥姥说她早上起来看见了喜鹊登枝。我考上高中那年，奶奶则说她看见了喜蛛。我不知道张村对蜘蛛如何分类，哪一种蜘蛛是悲哀的蜘蛛呢？总之万物有灵。这是萨满教的传统。黄鼠狼就更神乎其神了，如果你相信老太太们所言，那么它们才是世界的主宰。人们把这一切当做真事讲述。自然，你也会在街上遇到一些老头，他们坚持麻雀是四害之首。

其实张村人不把它叫做村子，而叫“堡子”。只要审视一下地名，你就知道这一带开化不久。附近的一个村子名叫“洼子”，意指当初是沼泽。另一个村子名为“南荒”。还有两个村子干脆以“狼洞”为名。“堡子”是东北对村庄的叫法，当初也的确类似城堡。张村起源于清初建立“牛录”，即八旗的最基本的军事单位，那正是汉军旗人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时候。

很多年间，这里如西伯利亚一般并无人烟。不久之前尚是一片荒野，河湾处大概摇曳着柳树毛子。我的外叔祖喜欢讲一个故事，他打草的时候，突然有人两手搭住他的肩膀，荒郊野外，怎么会有人呢？他立刻就识别出这是狼的诡计，继续打草，直到它离去，因为只有在他回头的时候它才能咬他的喉咙。

这般家族传说与口头记忆，随着老人仙逝，已渐湮没无存。我的曾祖父、曾外祖父乃至更早的祖先，也曾真实地生活过，可是除了名字，我对他们一无所知。当他们离开故土，到这里拓置，忍受苦寒，筚路蓝缕，是何景况？谁真正记得他们？没有人。留下何种痕迹？一丝也无。他们大概也不会像我们这般恐惧又着迷地注视政治与历史。只有基因流传下来。惟一的使命，惟一的目标。

我奶奶的爸爸本是教书先生，开馆授徒，竟然攒下不菲资财，最后拥有足足一百亩覆盖着腐殖土的好地。可见教师收入不错，土地也不昂贵。土改的时候，党打开了他的粮仓。花生哗啦啦地流淌出来。我姥姥和她的妯娌当时还很年轻，用大布衫兜着，带回家，立刻炒着吃。花生满街，踩了一地。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两家将成为亲家，我妈还没出生，我爸才三岁。

我姥爷对妻子的行为大为不满。“人家娘们哭天抢地，你们炒花生吃？”他说。他是蒙古族人，读过一点儿《四书》，一生都为自己懂得礼义廉耻而颇感自豪。他是一个快活的人。姥姥十六岁刚嫁过去的时候，夫妻闹小别扭，他就威胁她：“我把你旗头打歪。”“旗头”就是如今清宫剧里的那种发式，一个高耸而复杂的抓髻，如果打歪的话，姥姥要再花一个钟头梳起来。他与众不同，从不殴打妻子。后来我意识到，姥姥很爱他，即便那个年代并无爱的概念。她没什么文化，身材娇小，而他满面红光，身材健硕，说起什么来头头是道，又能引用孔孟的古训，自然令人崇拜。只有一件事，令姥姥对他颇为鄙夷。朝鲜战争爆发后，姥爷拒绝参加志愿军，让她大失所望。她本来以为他是个男子汉呢。那时姥姥像她那一代的妇女一样，被“妇女解放”四个字的光芒照暖了心怀。最终，大约 14 个张村的青壮男子去了朝鲜，有几个战死，还有几个伤残。即便如此，姥姥仍不肯原谅她的丈夫。别忘了她是满族女人。这跟三百年前也许没什么两样。当初，兵甲们这个牛录出发时，旗人妇女恐怕也期待他们视死如归。

我与母系亲属亲密，与父系则疏远。这一半是我妈的影响所致，另一半则来自我对自己的本性的逆反。父系更能代表我的血脉。爷爷，拥有无上的权威感，坐在火炕上，捏着白瓷酒杯，说着凡事不必在乎。他像个伊壁鸠鲁主义者一般，认为人间至善莫过于快乐。在死于癌症之前，他活得不错。如今我也有此倾向。摆脱了青少年时期的自我折磨之后，我越来越喜欢恬然的平庸，甚或回避真实的人生。恋爱？不不。对人直言不讳？只在必要的时候。问问自己的内心是否安稳？不必问了，当然。这并不稀奇：每个中国人都有这种倾向。我们总以自我保护为先。

可是欢乐总如缘木求鱼。我又想起每年暑假离开张村时的快乐。那时我可以在城里姑姑家呆上两周，坐乡村大巴进城去，我耐心等待着，终于有那么一刻，斑马线出现了。对斑马线的爱简直难以言喻。多么时髦，何其漂亮。越往城里走，斑马线越多。斑马线接着斑马线，斑马线的狂欢。我穿着喇叭裤，尽量显得跟城里小孩一样时髦，让表姐带我看电影和游泳。她溜冰的时候我拿着汽水。我贬谪了张村，并不思念蟋蟀的唧唧声、小鸟的鸣叫和傍晚时分蝙蝠一掠而过的声响。

自然，这也是媚俗的初步环节。我离开张村，进入了青春期，结识新朋友，开始加入人生的媚俗派对。对于张村我既感触多多，又毫无感觉。我已是早期文学青年，心中装满了程式化的怀乡之情、离别之意，同时我又仅仅是为了变化本身而欣喜。再以后，时光就像魔术师手中的牌，陡然有了一大沓儿。爷爷、奶奶、姥爷，如更早的先祖一样，已如青烟一缕不复存在了。

姥姥也垂垂老矣。她常躺在床上，久久昏睡。醒来时，她与中年女保姆感情甚笃。过去只有我能享受的待遇，如今落到了保姆的头上。每周有一天，保姆放假回家，当她离开时，姥姥总是趴在窗口久久目送，挥着手，抹着眼泪。这种情真意切看似难以理解，可是我们谁能理解一个垂死之人的孤独呢？事实上，最终她只能与保姆为伴。都忙啊，邻居们都这么对她说。可不是嘛，她回答。那还都抽空来看你呢！邻居们又说。我可好了，我享福啊。她这么回答。

我表弟的媳妇是那种典型的东北女人，操持一切，毫不畏惧。我曾亲眼目睹她丈夫遭遇困难时她如何泼辣地出头。那真是了不起。后来日本地震传言盐荒时，她足足买了 200 包盐，送到每个亲戚家里——无论如何，那是很多人想尽办法却连一包都买不到的时候。她常去看望姥姥，给她买了一切所需，羊毛衫、鞋子、松软的糕点、果汁、药和“老年人内裤”。最后一样东西让姥姥哭了起来。我想大多数人都不清楚这种东西有多么重要。张村人总是说到“得济”，指老人得到了谁的奉养。也常有人说姥姥得到了我的回报。可我的确没做过什么。一切又要回到那个古老的主题：爱与被爱是不对等的。我们都承认，回报者常常不是当初那个受惠者。

岁月的负累与伤痕，无人记取，却未曾消失。不只姥姥衰老，父辈们也不再年轻，似乎变成了孩子。我妈有一次需要超过其积蓄的款项，想向舅舅借钱，我说不要借钱，我给你就好。她说，他借给我也是应该的，我年轻时有个对象，成分不好，因为你舅舅要入党就吹了，前几天我去看你姥姥，你姥姥说起这事，都说对不起我。我哑然失笑，仍旧阻止了她。二姨始终记得小时候小姨如何抽了她一记耳光。舅舅则会说起，当他是少年人，放学不喜欢回家，一回家就说不上来的难受，心里憋屈，压抑，就跑到河边去喊叫。另一个舅舅，如今宛如儿童。过年的时候，由于家长里短的矛盾，他决定跟家族断绝关系。当我去看望他时，他僵直地站在客厅中央，气鼓鼓的，泪光闪闪。他不得不控诉了一番，我的理解是，他已决心远离尘嚣。

父系亲戚那边情况不同，但也庶几如此。每个人，活了大半生，不是都有一番隐秘之情不曾倾述吗？体面与否等等，不过是虚无的微光，最终人们所有的都只是不可比拟、不可名状的人生。

这次张村漫步之后不久，姥姥就去世了。临终时她尚得一番抚慰，表弟告诉她，你什么都不要想，啥事都有佛爷照顾着呢，你就念佛吧。她捏着念珠，安然而去。家族操办丧事，井井有条。守灵一夜之后，次日早上，有个妇女说她看到天上出现了一朵观音形状的云，于是二姨把消息告诉给每个人。人们开始彼此询问，看到了没？看到了，看到了，老太太真的成佛了，每个人都这么回答。整整一天人们都在相互佐证。看到了没？看到了。这老太太多有福。

我不免又想起自己得到的和未曾得到的爱，想起少年心气，乃至与姥姥有关的一切。即便是她，大概也不清楚我少年时的心中所想。是否我的祖先从未有过超凡脱俗之类的愿望？或者当他们展露这一点时被视作失常或者畸零？他们的悲欢漫漶不清。他们总是说，这个，那个，不值得在乎。我也不清楚他们的一生是否得偿所愿。在我的记忆里，爷爷们只是捏着酒杯，面色酡然，一再说着凡事不必在乎。在这个国家，至少在张村，三百年来，我们追求的不是什么超凡脱俗，也不是美，我们追求的甚至不是幸福，而是对诸般不可避免的不幸的安然以对。

总是如此：自我，往日，如影随形。生与死，衔枚而至。白色的蚌足在软泥中伸展又消失。

多年来，我几次梦见自己还在张村。我跳进一个后院，又跳进一个后院，再跳进一个后院，就像《红色角落》里理查·基尔从一个四合院跳到另一个四合院。也许我想躲开什么人。也许是大人。不知因何，不知所往。在梦中我总是孤独地穿过张村的后院菜园，四周是弯曲的暗调。有一次我醒了，梦境仍栩栩如生，一瞬间我清晰地意识到今生虚幻，而梦中情形才是真正的人生。

（李海鹏，作家，著有《佛祖在一号线》、《大地孤独闪光》和《晚来寂静》等。原文链接：<http://cn.nytimes.com/article/culture-arts/2012/07/03/cc03lihaipeng/>）

[【返回目录】](#)

【漂】

9-3 周昂：北岛：城门开后

“那次回乡使我终于意识到，回去的路是没有的，我没有家，漂泊才是我的命运，一个漂泊者只能四海为家。治愈，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其实就是‘彻悟’。”



旅居国外的日子里，诗人北岛曾写下诗作《乡音》。开头写道“我对着镜子说中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母语是他在异国缓解乡愁的唯一方式。而结尾则深埋着找不到回家之路的痛苦，“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听见了我的恐惧”。

2011 年 11 月的一天，在“香港国际诗歌之夜 2011”上，北岛再一次朗诵了这首诗。此时，“中文”仍是他人人生行李箱里最重要的物品。而北京，那个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却再也无法让北岛感到思乡的恐惧了。

“回不去，也不想回，北京跟我已经没什么关系。”他说。

2001 年底，在阔别家乡十三年后，北岛回到了北京。这显然不是一段如他预想的愉快行程，他后来回忆到，在飞机降落时，自己看到万家灯火着实吃了一惊，“北京就像是一个放大的灯光足球场”。可在儿时的记忆中，北京至少要暗上一百倍。

1989 年离开故乡时，北岛见证的是一个尚未消逝的古老城市的尾巴，十三年后，呈现在他面前的已经是一个高度物质化的城市，它脱胎换骨，生出一副和许多世界级大都市一样美妙而千篇一律的面孔，这显然让北岛有些措手不及。他发现，自己甚至连家门和读过书的学校都找不到了。

在居留北京的这段时间，他写下了诗作《黑色地图》，后来他解释道“地图是确定方位的工具，但黑色又是一种屏蔽。回乡之旅又是迷失之旅，那个地理上的家早就不在了”。

这也成为了他一个念头的起源，他要借着作家的身份，以文字重建一座北京城，重建“他自己的北京”。

于是，2010 年末，有了《城门开》这本书。在这本回忆老北京和童年生活的著作中，北岛把自己视作那个古老城市的看门人，“我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欢迎所有好奇的客人们。”

在开篇的几章里，作者纤如发丝般地回忆了北京城的光与影、味儿、声音。然后是家具、钓鱼等一些更有故事情节的“事儿”，再后面的几篇，追忆他的成长，最终收尾于《父亲》这个具有精神象征的意象之上。

有书评这样写道，“在这本书中，北岛不仅仅用文字重塑了一座记忆之城，也为归乡的游魂们建立了路标，使他们得以从物质上的细节启程，一路前行，来到一个安放精神的所在。”

以精神上的家园，取代物质意义上的故乡，这或许是这个游子为自己找到的“回家之路”。

他一度丢失了自己的故乡。80 年代末一个夏天的晚上，在柏林，北岛和一个姓周的北京小伙子一起看 CNN，喝光了一瓶威士忌。第二天早上，小周磕磕绊绊爬上楼梯，和他抱头大哭。也正是从那一刻起，北岛知道，回家的路断了。

后来六年的时间里，他近乎疯狂地搬了七个国家，十五个城市，这种感觉“令人惶恐”。北岛说，头几年住在北欧，天一黑，心就空了，只有酒陪他打发那漫漫长夜。

他为寻找回家之路而忧愁。在一首题为《背景》的诗里，北岛这样写到：“必须修改背景/你才能够重返故乡”，“背景”包括国内的人们给他贴上的各种标签，甚至包括“朦胧派代表诗人”这样的头衔，但实际上连他自己也知道，“背景”不可能修改，因此，故乡也是回不去的。

这时，“对着镜子说中文”，也就成为了北岛与故乡之间唯一的羁绊。他后来接受采访时曾经说道，漂泊其实不但没有使他与中文疏远，恰恰相反，两者的关系更近了，或更准确地说，是他和母语的关系“改变了”。

事实上，身为作家的北岛从文化中获得了一种向上气质的精神故乡。“对于一个在他乡用汉语写作的人来说，母语是唯一的现实。”就像诗人布罗斯基的一个比喻，在这种境遇中，母语会“同时成为一个人的剑、盾和宇宙舱”。

而 2001 年的归乡，使他更加确认了地理意义上的故土难回，不是回不去，而是故乡已经没有了。从此之后，他的乡愁变得没有指向性。去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说“自己漂泊二十多年，现在不知道家在哪儿，是北京，也是加州，可能也是巴黎”。

其实，他的乡愁已经开始指向了新的方向，他说，“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一个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特别是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

他把自己漂泊在外时的经历结集，取名《失败之书》，他觉得“失败”比起“成功”，更能让人安宁。

好比北岛把《父亲》一文视作他与父亲的“和解”一样，《城门开》这本书，或许也可以看做他对那个地理意义上的故乡的道别，在为这座城市的残骸默默祈祷之后，他要继续构建自己新的故乡。

2007 年 8 月 1 日，在旅居欧美近二十年后，北岛定居香港，执教于中文大学。1987 年，诗人曾经来过这座城市，当时留下的印象是，这里拥有秩序之美，但它的效率太高以至于没有缝隙，艺术无从生长。

“如果说中国是一幅画，那么香港就是这幅画的留白，而我是在这留白处无意中洒落的一滴墨。”北岛这样定位自己与香港的关系。

尽管自己脚下是很多人眼中的“文化沙漠”，但北岛并不试图寻求回到故乡生活，他说：“香港这个距离挺好，不那么远，在中华文化圈内写作。我也受不了国内文化和学术的浮躁环境和氛围。回去了要受不了，要不被同化。”对于这位花甲之年的游子来说，精神上的自由舒适最重要。

他还乐观地认为，香港有着独特的文化生态，对中国文化有很大影响，比如国际化程度很高，除了改变香港本地，也会影响到大陆。况且，相对于以前在美国小城市教书时得首先考虑“在哪里能买酱油”，香港的生活环境已经够好了。

当然，一切还可以做得更好。2009 年和 2010 年，由北岛亲自策划的两届“香港国际诗歌之夜”成功举办，他希望借此改变这座城市没有诗歌传统的文化生态。2010 年刚刚举办的这一届上，有一个诗人与香港中学生诗歌分享会的环节，活动结束后，北岛特意叮嘱学生们去买一本诗歌之夜专门制作的诗集，一本只有一瓶水的价钱。

在一次名为《诗意地栖居在香港》的演讲中，北岛说道，“没有创造性与想象力的加入，一个再富裕的香港也是没希望的……”

或许，这句话适用于每个人的故乡。

对话北岛——重建故乡，首先要自我唤醒

Q = 《中国周刊》

A = 北岛

Q: 您在《城门开》的序言中写道，自己要用文字重建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认如今的北京。您否认的是什么，重建的又是什么？

A: 那是悲愤之言。你想想，当一个游子回到阔别了 13 年的故乡，一切变得面目全非，那有多么绝望。幸好我是作家，还能用文字召回往事与记忆。在这个意义上，重建故乡，首先要自我唤醒，如果可能的话，再唤醒别人。

Q: 您在去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2001 年的回乡治好了您的思乡病，因为北京已经不是您记忆中的城市。治愈某种疾病，本应该是喜悦的，可对您来说，是这种情绪吗？

A: 那次回乡使我终于意识到，回去的路是没有的，我没有家，漂泊才是我的命运，一个漂泊者只能四海为家。治愈，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其实就是“彻悟”。

Q: 您曾说，自己前几年曾经回过上海、苏州、绍兴等城市，发现它们和北京一样正在被“毁灭”。这种感觉从何而来？

A: 两年前，《今天》杂志做了个“中国当代建筑专辑”。我们请人采访了一位很有名的城市规划师。他在访谈中说，在短短几年内，由他亲手改造的城市就有几十座，其根本方法就

是成批复制。只要听听他大言不惭的口气，就知道毛病出在哪儿了——掌握我们城市命运的正是一批和这位规划师水平相当的技术官僚，他们对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改造基本上是无知加傲慢。像这样的城市规划师，其实就是体制的一部分。

Q：您曾说，自己选择定居在香港，除了它保证您在中华文化圈内写作，也因为内地学术氛围浮躁，“回去了要受不了，要不被同化”。这是否也就是说，在故乡的物质层面发生巨变的同时，人的精神状态也和过去不同了？

A：我深知自己的弱点——定力不够，回国几次的经验证实了这一点。眼见着不少当年的朋友纷纷被金钱或权力打倒了，我若身在其中，又如何幸免？我说过，物质主义可比集权主义厉害多了，它无所不在，让人失去反抗的能力。

Q：您在《对未来发出的 9 封信——致 2049 的读者》中写道，您梦想着“中华民族早日从物质主义昏梦中醒过来”。在您看来，我们的故乡是被物质主义毁掉的吗？

A：回答已经在我这句话的陈述中了。

Q：您曾说，自己在海外漂泊，对于生活多年的加利福尼亚现在也有乡愁。这是为什么？

A：我对很多住过的地方都有乡愁，这难道不正是四海为家的常态吗？比如加州的戴维斯、巴黎、纽约、柏林等，如今再加上香港。

今年的“青海湖诗歌节”上，我读过自己的诗作《回家》，在“香港国际诗歌之夜 2011”上，我读的是《乡音》，两首诗都和故乡有关。如果细读这两首诗，你会发现，那是对所谓乡愁的形而上的思考与感受。对于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诗人来说，汉语就是故乡。这是在更深层意义上的认同。

Q：您曾在发言中提倡青年“诗意地栖居”在香港。“诗意地栖居”，是否是您对故乡的一个衡量标准？

A：“诗意地栖居”是海德格尔的话，简而言之，指的是行尸走肉般苟活的反面。无论我们住在哪儿，生活多么艰难，都应该有一种向上的精神维度。这本来是常识，可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很多人都忘了这一点。

Q: 在去年的采访中您说，香港不会是您的永久居留地。那么未来的您，将如何选择自己的终老之地？

A: 对认定漂泊的人来说，我从不预测也不计划自己未来的行踪。记得二十岁当建筑工人，我的师傅说得好：哪儿的黄土不埋人？这话包含了千百年来流离失所的老百姓的真理。

Q: 您可否描述一下您心目中的故乡？

A: 小时候，我常画这样一幅画（恐怕很多孩子都画过的）：一条小河，一棵树，一栋小木屋，从烟囱冒出炊烟，再加上太阳和几只小鸟。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故乡。

（周昂，《中国周刊》记者。北岛，诗人，生于北京，现定居香港。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weekly.cn/bencandy.php?fid=63&aid=5861&page=1>）

[【返回目录】](#)

9-4 黄修毅：哈金：等待与回归

“过去你不可能和它一刀两断了，虽然你在路上，虽然你很难回去，但过去你必须带着。如果都带着负荷不了，那就只能带着对你有用的部分，否则太沉了。一个亚裔移民在美国，过去就写在你脸上。抵达是一种心态，你真正到哪儿是不可能的，你到那儿可能也就是失望，所以上路是最重要的。”

编者按：

于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再也无法回家，我们必须寻找自己的伊萨卡，并设法找到通往那里的道路。但是，我们也应该记住，无论我们向何处行进，都不可能完全摆脱我们的过去。

——哈金《在他乡写作》

“过去你不可能和它一刀两断了，虽然你在路上，虽然你很难回去，但过去你必须带着。一个亚裔移民在美国，过去就写在你脸上。抵达是一种心态，你真正到哪儿是不可能的，你到那儿可能也就是失望。”

算上这个秋天中英文版同步发行的新作《南京安魂曲》，在国内书架上能找到的哈金的作品，也只有区区两部。尽管他坚持认为，“我的作品应该被国内的读者读到”。

上一部在国内出版的哈金作品，还是那部十年前为他赢得了福克纳笔会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的长篇小说《等待》。

用英文发表作品二十个年头，哈金几乎每发必中，囊括了美国多个重量级的文学奖项。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Ocean of Words》（台译《好兵》）即摘得 1996 年海明威笔会奖，第二部短篇集《Under the Red Flag》（台译《光天化日》）获得奥康纳短篇小说奖，其后又凭

长篇力作《Waiting》（《等待》）和《War Trash》（台译《战废品》）两获福克纳笔会奖。2006 年，更跻身美国科学与艺术学院，成为首位华裔文学院士。

美国当代文学和批评界的泰斗厄普代克曾断言，哈金作为非英语母语作家交出的这张辉煌的成绩单，在康拉德和纳博科夫之后，几乎无人比肩。

但康拉德和纳博科夫早已进入了英语写作的传统，之后又被各自的母语所接纳，而哈金的处境更像是一个尴尬的孤案。“出国前，写过一些诗和一两个短篇故事，但从来没有发表过。”直到三十多岁，才下决心用英文写作，等到在国外写出了名堂，在国内却是鲜为人知。

他算是一个华裔的英文作家？还是用英文写作的中国作家？属于时下席卷世界文坛的移民文学潮？还是生存于文化缝隙中的非母语作家？这些身份之辩时常纠缠着哈金的写作。“等待”一直是他写作中的一个母题，就像“回归”一样，总是横生枝节，总是前路在望，又总在临近抵达时遭遇触礁的险境。

回不去了

如果不是人生中经历的那场巨大的变动，哈金自认为现在很可能在国内做着翻译，或者当上了英文教授。

1986 年，他从山东大学取得英美文学硕士学位后，前往美国布兰代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攻读博士。在原本的人生规划中，三五年之后，他就将学成归国。但在美国读博期间的那场变动，让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回不去了”。

这个本名金雪飞的青年，在 1977 年恢复高考后，从中朝边境的一支驻军考入了黑龙江大学。但英语并非他的志愿，只是理科成绩不过硬，被调剂到了这个专业。每次拿英文开练，他都要头痛腮帮子疼，为了去掉东北味的“儿话音”，练到舌头发酸发硬，班上甚至还有同学吃止疼片。他最初给自己确立的目标，是要能读懂英文版的恩格斯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生存条件》。

在英美文学的课上，从原文接触到福克纳、海明威等现代派作家的作品，才刺激了他学习语言的动力。去美国，则是为了完成博士论文，关于奥登、叶芝、庞德、艾略特等英美现代诗人作品中的中国文化内涵的研究。但直到那时，他也从没想过要当一个专职诗人或者作家。

第一首诗歌的发表纯属意外。写作课的任教老师弗兰克·毕达把这个中国学生的一首作业《士兵之死》，在电话里逐字逐句地念给《巴黎评论》的编辑听。编辑当下拍板发表，征询作者的署名。没怎么多想，“哈金”这个英文笔名就从金雪飞嘴里脱口而出。“HA”取哈尔滨的第一个音节，那是他执情至深的一座中国城市。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滞留美国的哈金接连出版了两本销路不佳的诗集。为谋生路，他甚至给工厂当过守夜人。直到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出版之前，整整八年时间，他折返于投稿和收退稿信之间。和周围的邻居也没什么来往，每天晚饭后，一个人拄着一根驱狗棍出没在屋子旁的小湖边。

在这一时期写成的两个短篇集《好兵》、《光天化日》和一个由短篇发展成的长中篇《In the Pond》（台译《池塘》），写满了哈金在国内生活的印迹。他笔下的故事多发生在一个叫歇马亭的虚构之地，五六十年代北方城乡的景物，在风吹麦浪中躁动着强烈的真实气味。甚至“文革”中的残暴与蒙昧，在哈金的笔下也带着生命粗犷的盲目感，和虚伪的道德气氛中不失精明的算计。

《池塘》的故事写了一个在工厂里自学成才的半吊子知识分子，因为分房的不公平点燃的不满，用自己的书画才能讽刺当权者，一不小心触怒了体制。但整个故事非但没有伸冤抱怨的戾气，反而把被逼入死角后的种种精神膨胀，在轻快的行文中宣泄直下。好像一个承受了过度痛苦的人，反而以参演戏剧的热情投入到生活的舞台上。

哈金也承认，在创作中对果戈里、契诃夫、巴别尔等“像虫子一样小的人物”的大师算了一笔“欠账”。早年在中朝边境的部队服役期间翻烂了半本《安娜·卡列尼娜》，俄罗斯文学奠定了他的精神底子，甚至在最初开始写作时，他以“为底层发言”为自己的文学志向。

他希望没有英文阅读能力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能在国内读到自己的书。但每次踏进唐人街的中文书店，对他都像是一个刺痛提醒：自己的书还未在国内完整出版。1999年《等待》在英语世界取得的巨大成功，曾给哈金带去“回归”的希望，结果却未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二十多年来，他一直被驳回回国探亲的请求。

2007 年夏天，车过蒙福特州，哈金顺道拜访了前苏联流亡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旧居。周围的邻居仍以“亚历山大”来称呼生活在故去的大师宅子里的家人，但铁栅栏围起的孤宅，孤零零地和周围景物隔绝开来。似乎印证了一个在困扰哈金已久的疑惑：索尔仁尼琴晚年作品的文学性小于流亡前写出的《癌症楼》，这和作家远离故土的状态密切相关。而自己当初“为底层发言”的文学志向，“没意识到所选立场的复杂和不可行性。”

在语言的空隙中写作

如果当时回到国内，他会提笔写作吗？在这样的假设面前，哈金坚决地否认，“不，不，不”。尽管他自认“本可能成为一个好的中文诗人”。

在他最早开始酝酿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写作历时最久的作品《The Crazy》（《疯狂》）里（1988 年动笔，2002 年完稿），里尔克和但丁上抵天庭的高处之诗，间杂着李白、杜甫愤世的遣怀之作，裹挟在平滑的小说文本里，从一个发了疯的老教授的嘴里一蹦一个激灵。不仅哈金作为小说家的叙事能力一览无遗，而其作为诗人的洞察力，也让两种诗歌传统辉映出新意。

《疯狂》里那位老教授在发癫时吟诵起杜甫的“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层茅”，硬生生安到自己的名下，偷换成“文革”下乡时的内心写照。一个老知识分子面对评不到职称、分不到房等现实的不甘，只能寄情古诗词。在陪床的学生眼里，激起的却是“怜悯、痛苦和厌恶”，“一辈子半行诗也没写过，甚至要靠古诗来表达欲望。这种情操固然高尚，但已变成陈词滥调。”

哈金有着诗歌中比较文化研究的功底，但中国元素从来不是他作品的卖点或装饰。华裔英语作家 Gish Jen 如此论断，“哈金写作中静止的时间性对美国小说而言，完全是新的。他主张向西方大师看齐而非要颠覆传统的姿态，又是完全中国化的。”哈金本人的说法更加直接：“我们谈到小说就是西方的形式，这个必须得老老实实。”

尽管常被拿来和康拉德、纳博科夫等英语文学中的强势外来者比照，哈金的英文还是时不时地被批评家们“挑刺”。厄普代克在评论哈金写华人移民经验的小说《A Free Life》（台译《自由生活》）时，就举出不下二三十处问题，从而质疑英文中化用中式俚语乃至中文腔的

可能性。他甚至搬出约翰逊博士编纂的权威英文词典的体例，直指哈金小说中所犯的外国人使用英文的常见谬误。

这并不是对哈金的刁难，而是非母语写作者所要面对的障碍。被哈金视为英语拓荒者的纳博科夫，当年就因为小说中过多的双关语和外语腔而备受争议。这个常抱着一部韦氏大词典钻研的“词典狂”，在哈金看来不属那类“在字典的范围内写作”的作家。“我们在英语的边缘地带、在语言和语言之间的空隙中写作，因此，我们的能力和成就不能只以对标准英语的掌握来衡量。”

面对英语读者，哈金最常被问及，“为什么能写一手漂亮的英文，但一张口却是疙疙瘩瘩的口语？”移居美国二十多年，哈金还是操一口钝重的英文发音，说起话来不免字斟句酌，活脱脱他笔下那个华裔移民武男（《自由生活》主人公），急起来还会把“boss”念成“bawss”（音“保司”）。

哈金在美国的家安在了波士顿，这个和哈尔滨几乎处于同一纬度的城市，窗外白雪皑皑的冬景，恍惚间让人回到地球背面的另一个家。在哈金笔下，移民的梦一直都存在“总是反复做着同一个回到国内的梦，总是在梦里满大街找厕所，‘哪儿有干净的厕所？’直到从梦中惊醒。”

南都周刊 对话 哈金

我的部分作品在国内的缺席，不会影响它们本身的品质

南京大屠杀是国际经验的一部分

南都周刊：时隔十年，你在国内出版的新作《南京安魂曲》以南京大屠杀为历史背景。近些年，国内书写大灾难题材的文学作品已变得十分鲜见，而海外华裔作家如张翎写唐山大地震的《金山》、严歌苓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金陵十三钗》等，因为电影的改编而受到了更多关注。你为什么也会对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感兴趣呢？

哈金：没动笔前，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在我心里很多年了，也算是块心病。到国外以后，看华人每年都有各种纪念活动，照片和资料很多，很震撼。没出国之前只是听说这个事件，具体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我 2008 年春季开始写，写作之前，没看到过同类题材的中国文学作品。

写完之后看过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我想我们不同点还是很多的。她写的是大屠杀期间的事，时间跨度比较短，而我的作品是写事发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而且我写的人物比较集中一些，主要就是两个，一个美国女人和一个中国女人。

让我感兴趣的一开始是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然后是明妮这个人物。《南京安魂曲》的故事建立在这个历史人物——美国传教士明妮的身上，在英语当中有两部她的传记。南京大屠杀以后，明妮在南京又呆了两年多，这两年里没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我又不能随便给她乱安上什么，只能按照她的生命的轨迹，在各种历史资料中找一些戏剧线索，看看能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南都周刊：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有其特殊性，在以往的官方话语中，它是和民族主义紧密相联的，民众在心理上会产生一边倒的判断；从人道主义视角反思这个题材，尤其是《拉贝日记》出版以后，又提供了一个超越国族和政治立场的视角；你重新书写这个题材，是否想提供一些新的东西呢？

哈金：我没想到要提供什么新的东西。因为我要写一部文学作品，只能从个人的角度写，用个人的眼光写。我的主人公明妮是个美国的传教士，她在南京当地有一段时间被认为是个英雄人物，但以后就没有人知道了，所以我要把这段历史重新写成一个故事。

南京大屠杀在中国毕竟是一个重大事件，是一个历史的心理阴影，选明妮这个角度，是因为她是一个美国传教士，所以它也是一段国际经验。我的书最后写到，战争结束之后中国谁都没想到怎么去审战犯，也没有证据，上法庭什么都没准备。靠的是传教士他们搜集的资料、记录、照片，还有电影胶卷。其实细想一下，南京大屠杀也是他们自己的经历。所以虽然这是一个中国的历史故事，但也属于国际经验的一部分。

南都周刊：明妮是你在《疯狂》中的杨教授之后，塑造的又一个疯狂的小说主人公。但和《疯狂》展示的陷于精神癫狂的人的状态不同，在《南京安魂曲》中探究的是什么逼使人走向疯狂？

哈金：明妮的真人就是自杀了，就是疯了。她这种疯狂不是个人的疯狂，不是犯了精神病，而是战争逼使她疯狂，写的是战争对人内心的创伤。她同意日本人在难民营里选妓女，对她来说不是个小错误。她日记上记载了，因为没向上级汇报，她对这个事情非常惭愧，事后马上病倒了，两个眼睛都肿起来。我认为她心理上受到了重大的创伤。

南都周刊：小说主人公的这种疯狂似乎总和某种自我承担的责任感，和关于背叛的纠结有关。从中引出的基督教思想在中国的影响，和你早期在东北的生活是否有关？宗教体验在你的小说中是作为联系不同背景的读者的文化要素出现的吗？

哈金：我在中国东北生活时只感受到很少的基督教影响。来到美国以后，才感觉到生活里比较多的宗教色彩。当然，老一辈的东北人中肯定有人接触过基督教，而我不是一个信徒。

南都周刊：从前两本书的移民题材，跳跃到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历史题材，你在写作上进行的这些尝试，是不是试图解决你远离中国当下现实的问题？

哈金：这是现实，是没有办法的。有些书只能用中文写，但问题是我回不去。写一个长篇，那得好多年的工夫，包括心理上的、材料的准备。你要是受外来因素影响突然打断，那一下就完了。如果没办法改变个人存在的方式，就要想办法找一些新的办法写故事。我现在在大学里教写作，学生到后来都会意识到，要写小说找个故事并不难，一笔一笔怎么写出来到最后成型，是最难的。我对中国当下具体的东西不了解了，确实有障碍，但对中国宏观的把握，比过去要好得多。前两天我在纽约见到余华、苏童、徐小斌，大家聊起来，我对国内的情况知道得并不比他们少。

但写小说真正难的是细节，方言是怎么变的，各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你要写民工的话，民工挣多少钱，他们怎么住的，医疗保障怎么样，孩子在什么地方上学，这些不是光靠书本资料能够解决的，最好的办法是跟他们一块儿混过。像我这种情况，你起码得住上两三年，那种节奏和感觉都找到了，才能做。但是我现在做不到，很想做，但是没这个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写和个人存在有关的题材。南京大屠杀我是选一个角度力所能及地来做，我也可以用军人的角度写，那就跟之前的《战废品》是一个路子，我不愿意那么做。

投入另一种语言的牺牲

南都周刊：你赴美留学时，完成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关于奥登、庞德、艾略特、叶芝等的英语现代诗中的中国文化素材。你如何估量西方文学教育对你创作的视野带来的影响？

哈金：我在国内读研究生的时候读的都是英文小说，海明威、福克纳也是那个时候读到的，我一度对福克纳很着迷。出来以后却发现美国作家读的是俄国小说。我直到在波士顿大学学习写作的时候，才开始认真读俄国作家，比方果戈里、巴别尔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是在国内看过一点托尔斯泰之类，但是不太愿意看，也看不出个名堂。周围都是革命小说，托尔斯泰的东西格格不入。后来在美国再读托尔斯泰、契诃夫的时候，非常感动，觉得他们的作品跟自己的经验更接近。

南都周刊：作为一个非英语母语的作家，你说过“是在语言和语言之间的空隙”写作，你在英语中化用一些中文俚语和修辞的做法，也引起过一些争议。厄普代克在对《自由生活》的评论里，就专门挑出了他认为不符合标准英语的地方。

哈金：有个问题是英语中的一些词他们不用，比方 *emplotomania* 这个词，表面的意思是“拼命找活干”，但对应中文“官迷”，英语当中比较准确的就是这个词，他们比较生疏，但这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现象。还有一个是我在英语当中模仿华裔移民的一些口音，有些人对这个可能比较反感，但移民就是这样，你让他说标准英语，不行。我在《自由生活》里可能是动作大了点，但从长远看不一定是坏事。

南都周刊：如何把握突破“标准英语”的尺度？

哈金：这要看具体情况了。如果是一个中国农民在我的小说里说话，那肯定得发明一种不标准英语。你必须写一种好像就该是他口中说出的语言，但其实完全是创作的，并不是直接挪用过来的。这没有什么规律，你只能根据不同情况来处理。但问题是有些人能接受，有些人不能接受，有的东西在当时被接受了，不代表在将来还能被接受。所以这都看你自己的把握。纳博科夫的好朋友爱德蒙·威尔逊还一个劲地给他找语言上的毛病。纳博科夫很幸运，我的写作中没有像威尔逊这样的角色。（笑）纳博科夫觉得虽然自己有些地方做得很糟糕，甚至让别人觉得可笑，但他运用英语的高度别人达不到。这是他的理论。

南都周刊：但你在英文中化用的中文修辞，在英语中有新鲜感，再翻译回来，就丧失了。比方“a giant disk (the sun) flaming a good part of the eastern sky”，翻译过来可能就是一句套话“太阳像圆盘一样染红了东边的天空”。

哈金：你说得对。在英语中用过的一种新鲜感，翻回汉语可能就没了。但我用英语写作，只能先考虑英语。而且汉语很难表现口音，它的字不光代表音符，想要在语音和语义上同时传达原文的感觉，偶尔能做到一点，但不可能从头到尾都做到。

南都周刊：这是你所说的“没有用母语写作对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的主要原因吗？

哈金：是这么一个问题。你一开始想用哪种语言写作，必须想清楚你将来的身份要投入哪一种语言当中。这是你必须作出的牺牲。你得找个位置，想想你能为那种语言带来什么东西。如果用汉语写作的话，得把别种语言中的东西化用到汉语中。老一辈的作家像鲁迅巴金，他们都懂外语，因为有外语的参照，他们对语言的容量和特点会比较清楚，外语的一些东西就可以融进来。我用英语写作，正好是相反。

南都周刊：设想如果你身处中文写作中，你会是那种敏感于语言更新的作家？还是语言上相对保守的作家呢（因为那样作品会更接近多数人的认同）？

哈金：应该是不会保守的，因为毕竟是接触外国文学比较多。汉语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变得比较乱。汉语需要真正的诗歌作品，通过诗歌来对语言进行整理。但现在可能更乱了。因为汉语本来就有这么一个问题，上海话、广州话，对北方人来说几乎就是外语。以谁的口语为标准，是个话语权的问题。在这点上金庸我是很佩服的，并不是武侠那些东西，而是他的语言，南北都接受。他创造了一种雅俗共赏的语言。汉语作家必须有强烈的语言意识，因为真正书写的语言总是离口语有距离的。

过去就写在脸上

南都周刊：你的文论集《在他乡写作》中谈到，家园的问题涉及“抵达”和“回归”两个概念。从《自由生活》你书写美国华人经验开始，是否这种思考的重心更多转移到在他乡建“家园”上？

哈金：也不一定，但要带着抵达的心态才能上路。我没一定要回去，没到那个程度。因为你也变了，家也变了，你回不去了。每部作品实际上是个起程，你不能在原地呆着。

南都周刊：《南京安魂曲》似乎流露出对“抵达”的前景更为黯淡的心境。小说主人公明妮把南京认作家乡，但是不仅遭到很多误解，甚至到最后也没有得到家乡的召唤，也是她陷入疯狂的一大诱因？

哈金：但是我这里头还有另一个人物是对明妮的修正，就是霍利。对她来说，家在哪里并不重要。这也是一种活法。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想和“抵达”或者“回归”不一定有直接对立的联系，就是人对自己过去的态度。过去你不可能和它一刀两断了，虽然你在路上，虽然你很难回去，但过去你必须带着。如果都带着负荷不了，那就只能带着对你有用的部分，否则太沉了。一个亚裔移民在美国，过去就写在你脸上。抵达是一种心态，你真正到哪儿是不可能的，你到那儿可能也就是失望，所以上路是最重要的。

南都周刊：所以你说：“比起流亡者来，你更是一个移民。过去不再那么重要，抓住新的开端，找到新的参照才是更紧迫的事。”

哈金：流亡者和移民不同。很多流亡者都是有身份有成就的人物，像我们这样，出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是。你如果不想着从现在开始，往往过去就成为一个包袱。但对流亡的人来说，他们的价值往往是由过去支撑起来的。所以不是说过去对我不重要了，过去对我现在的影响仍然在，但不是像对流亡者那样重要。

南都周刊：你作为一个华人作家有着文学世界里的“反常”经验。首先在英语世界里被接受，到现在也还没有被完整地引入母语汉语之中。

哈金：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到现在还有读者认为我是讨好西方，是卖国。实际上我有些故事对中国人的意义比对外国人更大。一个作家的身份是由作品建立的，而不是凭空口去说。我的部分作品在当下国内的缺席也不会影响它们本身的品质。当然，我乐意自己是一个在英文中找到位置的中国作家。

南都周刊：你的小说有着书写现代中国人经历的“连贯性”。但对国内读者而言，他们对于中国当代经验的阅读史却是断裂的，存在一些写作的空白。这种情况会对文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哈金：对作家来说，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自由，别看那些很小的自由，可到那个坎上，你敢说一两句真话，作品的层次就上去了。你不敢说，作品就变平庸了。各种政治和社会的变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实际上很大，往往是节骨眼上，就差一口气，就差一点精神。

南都周刊：你提出“伟大的中国文学”这一提法时，曾招致肖复兴等人的反对，他们一方面是出于国内文学屡遭宏大历史叙事绑架的忧惧，另一方面，则是受国内文学市场不振的困扰：文学读者近年来大量流失。

哈金：有的人可能有这种意识，也有很多人灰心。好像中国文学有一种先天不足，好像和世界文化有所隔膜，也包括社会和政治上的限制。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因素，是现在文学书卖得越来越少，文学读者越来越少。肖复兴说到离伟大越远越好，可能就是出于国内文学萎靡的近况。

但年轻作家写小说一开始就没有抱负，是走不远的，这是常识。我说的“大”不等于规模大，也不一定是宏大叙事，而是说艺术成就。年轻人还没开始，或正要开始，让他不想伟大的小说，他想什么？其实你看福楼拜，他根本不是才华出众，只是一心想要做好，最后就这么一点一点地成了大师。

（黄修毅，《南都周刊》记者。哈金，作家，生于辽宁，后移居美国，著有英文小说《在池塘里》（In the Pond）和《等待》（Waiting）等。原文链接：
<http://www.nbweekly.com/culture/arts/201111/28217.aspx>）

[【返回目录】](#)

【寻】

9-5 许知远：无根的丹青

“‘像是一种流亡之感’，他对我说，‘我是强烈靠记忆生活的人，跟你记忆能够有关系的视觉、触觉都没有了，1980 年代初的纽约还没有太多的中国大陆人，华人主要来自台湾、香港，每天醒着的时候全是这种感觉。’”



一

“拉萨的马路上全是尿的味道，夜晚时，牦牛就直接在睡在路中央，寺庙里飘出酥油香”，陈丹青这样回忆起对西藏的第一印象，“当时觉得像是到了外国了。”

那是 1976 年的秋天，陈丹青 23 岁了。他是个英俊的年轻人，178 公分的修长身材，有一张南方人的清秀面孔，大眼睛、鼻梁挺直。当他笑起来时，有一股少年人的憨厚，头发总是乱蓬蓬的，但在他的朋友中，他以能言善辩著称。在一幅他的朋友所绘的铅笔素描上，他表情严肃而倔强，似乎饱受委屈，随时准备展开一场反击。

在拉萨，他算是借调来的知青画家。他很乐意离开苏北插队那个小乡村。自从 1970 年起，他就成为了全国 1600 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的一员。最初，他被分配到江西，几年后他又跑到了江苏。真实的农村生活，既不像“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样激动与高尚，也没有古诗词中描绘到的静谧、诗意。

“每天下工后，我跟在牛后面回来，走在田埂上，天开始黑下来”，他被一种绝望包围，“完了，我到老都得在这个村子里面。”画画是他逃避绝望的方式之一。

他是 1968 年开始学习油画的，毕业于“行知艺专”的章明炎教他在油漆的大铁皮和水泥墙上画毛主席像。那时，文化大革命度过了它最动荡的两年。陈丹青目睹着周围人的命运的戏剧性起伏。当这场社会革命 1966 年 5 月份爆发时，13 岁的少年感到莫名的兴奋——他们不用上课了。但随即，兴奋转为了震惊与苦涩，他的知识分子的父母成为了被批斗的对象，他看着自己的家被抄，父亲给人摁着头在公共场合批判，而他自己被孤立起来——“昨天还在和你玩的朋友开始向你吐口水，扔石子”。几个月后，斗争范围扩大了，曾经嘲笑他的家庭也被批斗了。

我不知这幕眼花缭乱的戏剧是否深刻的影响了这个 13 岁少年的内心，令他觉得这世上没有什么稳固可靠的，也没什么值得相信的。不过，青春的活力和懵懂或许能暂时消化掉这些悲痛而荒诞。

社会机构被摧毁，日常生活失调，少年们却可能在混乱中寻找到的意外的自由。他在街道上无所事事的闲逛，焦急地等待着喉结的变粗，用说粗口掩饰自己的胆怯，并随时准备和人打上一架以证明自己。

他旺盛的好奇心也通过某种奇特方式来满足。“红卫兵抄家，反而把以前很难见着的外国小说、画报、画册，给散到社会上来了”，陈丹青说，“我们读民国时期翻译作品，英美法俄的古典文学，听古典音乐，当时流行傅雷翻译的《艺术哲学》，我看不懂，可是里面有美术史黑白图片。”

陈丹青的生活是双重的，白天他画毛主席像，夜晚则临摹达芬奇、米开朗琪罗，还有从垃圾箱里拣来的扑克牌——它的背面印有哈尔拉莫夫《意大利女孩》。他还幸运的碰到一些刻骨铭心的场景，那是 1968 年的春天，他在淮海路中路到陕西南路的一段水泥墙上，看到一群正在作画的青年，他们“一字排开，高踞木梯，手握大号油漆刷”，正在涂画一幅巨大的毛泽东油画像。几年后，他认识了这些比他年长几岁的青年，他们叫夏葆元、魏景山、陈逸飞、赖礼痒……他们是上海美专的毕业生，他们厌恶已占据中国艺术主导的苏联现实主义传统，试图在政治与革命题材上，实践对于德加、门采尔、柯勒惠支的理解。

初中毕业后，陈丹青的知青生活在赣南、苏北的农村和上海之间来回转移着。他试着摆脱沮丧的农村生活，他用 50 元贿赂南昌一所文艺学校的招生者，却还是失败了。他的艺术天赋偶尔派上过用场，他为江西人民出版社画过 3 本连环画，还曾为大队办的骨灰盒厂服务过——

青松、白鹤、夕阳、落日、兰花，他将这些形象绘在骨灰盒周边的空白处。他最愉快的时刻，还是溜回上海的油画朋友圈子，他和那些美专的学生已经相熟，他们躲在屋子里偷偷听三十三转的古典音乐老唱片，切磋如何打破已成为教条的苏联油画技巧，对于重新开始的全国美展议论纷纷。陈丹青第一次前往北京就缘于 1974 年的全国美展。怀揣从家里要来的 40 块钱，他换了好几次火车才赶到。“第一次上北京就像后来到纽约、到巴黎，走进中国美术馆就像走进卢浮宫，一泡一整天，赖在几幅画前，后面全是人挤着，比现在印象派展览的观众多得多了。”他回忆说。

这种热忱象征了陈丹青对于坐标的渴望。他们是一群散落的种子，凭着本能发芽与结果，能依赖的只是从紧闭床帘漏过的几缕阳光。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既与整个世界割裂开，也埋葬了自己的传统，而陈丹青和他的朋友，则依靠零星寻找到的历史遗迹、相互间的鼓励与影响而成长。青春无所畏惧的生命力、对僵化模式的反抗，还有那个时代特有的对恢宏气势的热爱，激发起他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并以一种错乱而意外的方式爆发。

于是在 1976 年秋天的西藏，陈丹青看到却是库尔贝、列宾画笔下的风物，是 19 世纪的俄罗斯的现实主义传统，他也记得朋友魏景山劝告——不是以素描去陈述对象，而是在对象中看见素描。

他还在拉萨遭遇人生中另一次重大历史事件——毛泽东的去逝。这一事件激发他画出了《泪水洒满丰收田》，金黄色稻田里、身穿皮袍的藏民，正围绕在一个小收音机旁，毛主席去世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波传来，他们神情悲壮……

这幅 154×235cm 画作，成为陈丹青的成名作，它入选当年全国美展，挂在令这个年轻人仰慕的中国美术馆里。它给人带来的冲击来自于画面的情绪，就像他自己所说的：“画工农兵哭，这在当时绝对不可以，可那是哭毛主席，但美术界欣赏的是悲剧性。”

对于 23 岁的陈丹青来说，画面上的情绪或许是悲剧的，但在私下，他则感受到一种莫名的希望和躁动——一个时代结束了，等待他的将会什么？

二

我再次见到陈丹青，已是 2008 年的 5 月，北京初夏的傍晚，干爽宜人。在东三环旁的一座小区里，他领我们进入他的画室——一套两层挑高的单元房。堆在东墙的木制画架框，他在欧洲旅行时购买的雕像，西墙墙上的他临摹的委拉斯凯兹的名作《宫娥》，老式沙发摆在房间中心，木桌上放着零食与水果，桌上那盆正娇艳盛开的牡丹，一下子让我出了神，它不仅散发香气，还带来了某种气氛，似乎只要沙发上再侧卧一名丰满女子，我就进入了一位 19 世纪欧洲艺术家的画室。

房间北面是整面的落地窗，一条铁轨横在窗外不远处，更远一点是这个不断变得更宽、更高、更闪亮、更喧嚣的北京的缩影：国贸中心、建外 SOHO、万达广场、嘉里中心，那些巨大的荧光广告漂浮在灰尘与夜色中，还有那座像是天外来客的 CCTV 大楼——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的倍受争议的作品。

“操他妈的文化背景”，我记得陈丹青不止一次的引用过库哈斯的名言，似乎语带讥讽。对于陈丹青来说，这座大楼和遍布在中国城市的新建筑一样，是“急于赶超”、“一心求新”的中国文化心理的典型流露。他将这个传统上溯到 19 世纪末，从那时起，中国的文化自信开始被摧毁，一代代人急于让自己变得和西方一样。李鸿章购买德国制造的坚船利炮；孙中山试图将美国共和引入中国；胡适想创造中国的文艺复兴；毛泽东想赶英超美，依赖的却是苏联的技术与制度。而此刻的中国，像是一个舶来观念的实验场，而结果经常是某种拙劣的仿制——像是一个小城里穿上西装的青年，似乎时髦，却总是不对劲。

这些言论，也是过去 8 年的陈丹青给予中国公众的印象——一名机智、犀利、渊博、直接的批评家，语言别致、感受细微的散文作家。事实上，我对于他的认识，是从他的写作，而不是他的画作开始的。

我记得 2005 年春天的一个深夜，我阅读到那本薄薄的、黄色封面的《陈丹青音乐笔记》。此刻的陈丹青已是个被过度谈论的人物，在杂志封面上、在电视屏幕前、还有互联网上，他几乎可见头皮的板寸、冷冷眼神、有点阴柔的英俊，还有那不变的黑色中式褂子，已是此刻中国社会最难忘的形象之一，像是某个民国人物——或是一名刚刚卸了妆的梨园爱好者。我记得书店里长期摆放着那两册一套的白色的《纽约琐记》，还有偶尔增加新的书名《多余的素材》，

或是《退步集》……我没有购买，一方面，它们变得过分时髦，在一群自认为有想法、有性格的年轻人中，人人都在谈论陈丹青，就像几年前，他们谈论王小波一样；另一方面，我对于艺术所知甚少。我模糊的记得他作为画家的标本意义。1980 年那组《西藏组画》早已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开端，在某种程度上它帮助中国人开始重新开始观察他们熟悉的世界。或许是对此刻中国艺术家正在获得暴发者式的地位感到嫉妒与不屑吧——他们没有特别才华与真诚，在这个视觉主导的时代，却获得过分的关注。所以，我对这个 30 年前暴得大名，然后在纽约销声匿迹，如今又归来的人物，保持着下意识的回避——过去十多年中，有多少人将在异国生活的贫乏经验，贩卖回国内。

但在那个夜晚，阅读这本偶然购买的小书，我却感得到自己内心的潮湿。上一次类似的感受，是来自于余华的散文集《高潮》，也是他倾听古典音乐的历程。我搞不清曲目的名字，记不住音乐家的名字，更分不清版本，但古典音乐却是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清晨时，它被我清理头脑，沮丧时，我从中获得安慰与鼓舞，而我工作时，它则飘荡在空间里，我知道当我需要一个抒情的结尾时，我该听一段拉赫马尼诺夫。我喜欢余华，是因为他试图在音乐中寻求叙事，在肖斯塔科维奇的旋律和霍桑的句字之间，找到相似的回应，那都是人类心灵的密码。

陈丹青则让我在音乐里，听到那些往事与记忆。比起他对于音乐家和音乐会的品评，我更喜欢他自身境况的描述。我喜欢他那样的语句，“终日作画，音响常开着。八九年冬初，是在迟午，纽约第 104 频道古典音乐台正播放肖邦”；或他对第一次听到《拉科齐进行曲》的记忆，那是 1970 年的赣南山中，他用自制的收音机偷听台湾的广播，“因是山野荒村更没人静的偷听，台湾女播音员的款款语调格外柔美”，“柏辽兹管弦乐一声声清亮清亮地奏起来，传过海峡这一边”……

比起余华那绵延、曼妙的长句子，陈丹青的措辞像是一截截被折段的小黄瓜，简短、干脆、滴着新鲜的露水，而且有一种读惯了翻译体文字的我不熟悉的白话文味道，像是新文化运动那个年代某个变种。除去语言的新颖，日后令他倍受争议批评风格也显露出来——即使在最抒情的段落，他强烈的社会意识与政治意识，也从未丢失。

这本书一下子颠覆了我，之前对他的回避，转化成一种敬意。以至于几周后，当我见到他本人时，有一种难以化解的紧张。那是在洪晃主持的一个谈话节目上，在南三环一间由破落舞台搭建的录影棚里，我们围坐在暗色藤椅上。大部分时刻，我们听陈丹青在谈，那时，他辞去

清华大学的教职的新闻，正沸沸扬扬。我对于他当天的谈话内容，全无记忆，却记得他是多么的会谈话——流畅、紧凑、选词新鲜而恰当，并且会在适当时刻爆出一两句粗口，仿佛他依旧保持着上海弄堂里的少年意气。

我对他的表现，充溢着赞叹与羡慕。“你的语言方式是怎么来的”，节目后，我问他。他一字一顿的说，他有老师，但他现在不想说是谁。但是，我也感到一丝不悦，我猜是因为他身上流露出的某种傲慢——他似乎对一个刚见面的年轻人，懒得多说上几句。几个月后，在另一次人数众多的宴会上，我再次碰到了他，我们在饭店门口相遇，我叫上一声陈老师，他的鼻腔中冒出“哼哼”两声冷笑，我分不清那是什么意思——算是某种招呼，还是他在人群中同样感到不自在？我只觉得他的某种冷，倘若在街头碰到他，我是不好意思拉他去咖啡馆里，去和他谈谈我的焦虑和梦想，指望他给我某种启示的。

我不知道这种小情绪是否影响了我对他的判断。总之，在我印象中，2005 年后的陈丹青，变成了一个似乎无所不谈的公众人物。他指责教育的堕落，批评建筑的夸张与无根，他追溯摄影的历史，谈论文艺复兴的内核，分析消费与时尚，还突然开始就鲁迅演讲，和人谈论八十年代，他还四处推荐木心的作品——对，这就是他所说的老师，在很多人看来，他将木心放在了后者不匹配的高位上……

至于他个人的绘画，倒是很少有人去追问，人们感兴趣的是他对那价格高涨的艺术市场的意见。他变成了各种观点的生产者。

有那么两年时间，我觉得他说得太多了，太快了，太流畅了，以至于让人怀疑他说的是否真诚，那些观点是严肃的思考，还是一场聪明才智的表演。这种怀疑，或许也是我对于八十年成名的另一位杰出人物阿城的态度。他和陈丹青等几位经常被形容成那一代最敏锐与智慧的人物，他们智力与经验似乎可以完成各种事。但我却发现，他们有智慧和感召力，却没兴趣承担起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更严肃的使命。或许，他们年轻时被各种空洞的口号弄得心力交瘁、遍体鳞伤，以至于怀疑严肃的使命，是另一种劫持和欺诈。我不知道这种要求是否是另一种专制，或许在潜意识里，我期待这个社会能够有真正的智力风范与道德勇气，而不仅仅是将自己的生活过好的聪明（或是狡猾）。

陈丹青，仅仅是又一个极度聪明的人吗？还是他的努力中蕴涵着些别的东西？

因为这次采访，我开始真正阅读陈丹青。我承认，它让我吃了一惊。不错，这些断断续续的文集中的一些，我已在报纸与杂志上阅读过的。不管何种题材，陈丹青总有能力将它表达得与众不同。我记得他在北京鲁迅纪念馆的讲演，他说到鲁迅的脸，“这张脸非常不买帐，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和俏皮”，我还对他引用贝特鲁奇所说的“高贵的消极”过目难忘……

而且，我得承认，他对教育、建筑、电影、当代艺术的诸多判断，是惊人的准确。他的写作风格也无比鲜明，他拥有强大的直觉，能敏锐在繁多的表面现象之下，寻找到被人忽视的东西，他的形象思维比逻辑思维强大得多，用铺陈、类比、列举，来取代分析、推理与逻辑……所以，他的文章中，被记住不是整体结构，或是具体的结论，而是他经常性的灵光一闪，或是格言警句——那里面有戳破窗户纸的畅快。

这种艺术家式的敏锐是他应对如此繁多话题的主要方法，而他的哲学与思想基础，与其说是来自某种特定的价值观，不如说来自于他自称的“常识与记忆”。对于“常识和记忆”的寻找，则耗费了他整整半生，如今仍在这个过程中。

三

1982 年 1 月的场景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严寒，阴霾。我从北京远赴纽约。上海转机一小时，隔窗遥望前来送行的父母和孩子，热泪长流”，陈丹青后来回忆说，“机身缓缓转弯趋向跑道，螺旋桨启动的剧风刮得机坪草丛成片倒伏，庞大机翼掠过一群正在列队操练的士兵，军衣阵营在风中抖动翻飞，望之壮观而萧条。”

那时的陈丹青 29 岁，他刚刚迎来了人生第一个真正的高峰。他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所朦胧的感到的希望，不仅成真，而且将他推到了一条眼花缭乱的快速通道上。

1978 年，他进入了中央美术学院。经过长时期的压抑之后，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变革也突然纠结在一起，一同爆发了。

邓小平复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中美建交、中越战争？西单民主墙、首都机场的裸体画、星星画展、伤痕文学……

而陈丹青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被青春的躁动、对艺术与自由的渴望，弄得兴奋异常。他依旧留着长发，尽管已 25 岁，结了婚，但仍是班里年纪最小的一位，脸上还有着青春痘的痕迹。食堂提供的白菜、米饭，不能提供给他们足够的营养，他们总觉得饥饿，却不妨碍他们声嘶力竭的辩论与争吵——中国这一切变化，意味着什么？

在陈丹青自己的描述里，他是个典型的愤怒青年，在全班开会发言时，因为年纪小，他总是排到最后一个，“讲一些我就不知道怎么再往下讲了，然后就骂人，然后就哭，就这样”。他的叛逆气质没怎么变，当星星美展的曲磊磊、钟阿城来到美术学院时，他在这些“野路子”身上，找到了更多的精神契合。

不过，这不妨碍他在主流中获取到足够的认可。那幅《泪水洒满丰收田》，是 1977 年的全国美展的参展作品，帮助他进入了中央美术学院。1980 年时，他再次前往西藏，经费则来自学校特批。

距离上一次进藏，已经四年过去了，陈丹青更成熟了，眼界也更开阔了，也画了更多，但他的方向没有改变——他仍在努力的摹仿，在寻找他者的眼光。上一次在拉萨，他看到的是苏联现实主义的景象，希望自己画得像苏里科夫；而这一次，他依旧在试图摹仿，他希望画得像法国现实主义，之前不久，法国乡村画展的带给他至深影响，于是他希望画出米勒眼中的西藏。

拉萨的半年时光，他画出了《西藏组画》。当时的他无法意识到，这组画将可能吞噬他，把一个具体陈丹青，变成一个抽象的陈丹青——人们围绕着他支持、反对、喋喋不休的争论。

对于美术，我所知甚少，时至今日，我也从看过《西藏组画》的原作，而且倘若你对中国美术史缺乏理解，对于 1980 年代初的中国气氛没有具体的印象的话，似乎也很难理解它引发的狂潮。

那是中国人热烈的重新寻找自己的过程。多年以来，他们被捆绑在一种单调的词汇、情感、颜色之中，他们渴望一种新的语言与感受力。不管这种表达来自何处，只要它与之前不同，那么它就可能引起广泛的争议，不管它是邓丽君的靡靡之音，萨特的“他人即地狱”，还是街头的红裙子……人们急于告别一个旧时代，用各种方式来寻找新时代，于是，人们在陈丹青的西藏发现了新时代——尽管他借用的是 19 世纪的法国眼睛，但在那个年代，只要它不是革命年代的色彩与形象，它就意味着崭新的、值得被不断欢呼的。

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陈丹青错过了那个喧嚣的八十年代，他的画作被视作那个年代的主要标志。他孤身一人来到纽约，怀抱着他自认的简单理想：去各个美术馆，去看原作。伴随终身的自省意识那时或许已很强烈，“这一切刚开始，就觉得《西藏组画》是个习作……先得出去看看”，他后来对说。

这是第二次甩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了。上一次，他从上海被扔到了江西南部的山中，饱受水土不服的煎熬，不知是否还能回到上海。而这一次，他则被进入了一个陌生之地。他从未离开过中国，对纽约一无所知，几乎不懂英语，所有熟悉的关系网络都消失了，他在国内的声名毫无用处，他像一颗水珠滴落到纽约的大海中。

“像是一种流亡之感”，他对我说，“我是强烈靠记忆生活的人，跟你记忆能够有关系的视觉、触觉都没有了，1980 年代初的纽约还没有太多的中国大陆人，华人主要来自台湾、香港，每天醒着的时候全是这种感觉。”

在纽约，他人生的重要一刻又开始了。他深陷两种困境之中，自信的坍塌和深深的孤独。前者来于那些美术馆和纽约的艺术环境。“我很早就意识到我们根本是个巨大的断层，文革后的我们是绕过苏联影响，回到欧洲 19 世纪前的大传统，就是说去接续徐悲鸿他们被中断的一切”，他说，但是他真的到了美国之后，发现他本来想寻找某个欧洲传统，发现的却是一个整体“希腊、文艺复兴、印象主义、现代主义，直到当时在苏荷发生的所有当代艺术：连现代主义都早已过时了”。

我猜陈丹青在那时的感觉，就像是一个长期处于黑暗中人，突然被扔到了强光之下，处于巨大的震惊与失落之中。而他这种内心剧烈的起伏，又无人可以表达，在英语的环境中，他同样感到失语。

与国内朋友的通信，变成了排遣内心的方式。他心急如焚的等待阿城的来信，等待他寄来的小说，他等待和访纽约的作家和艺术家的交流……

阅读是他另一种方式，这是他人生第二次高密度的阅读，上次是对俄罗斯文学的饕餮，而这一次，他则发现了那些在中国大陆被忽略的作家，张爱玲，沈从文，尼采……不知是他的懒惰还是顽固，他没有进入英语的语言环境，这些书是竖排的台湾版本。

他还发现了纽约的古典音乐台，一天 24 小时播放，其中一些曲目和旋律，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年轻时代，他们想方设法才搞到那些唱片。

而他的个人生活则依旧依靠“西藏”来维持。他算是幸运，一位画商根据他在国内的大名上门索骥，每年付给他一定报酬，但是他要不停的画西藏。于是，他变成了一名匠人，在西藏，他满怀着对法国米勒的崇敬下笔，而在纽约，他要兴味索然一遍遍的毫无快感的意淫西藏。

在纽约一间租来的画室里，他总把收音机调到 104 频道，然后开始画他的西藏。这种情形持续了六年。在这六年中，他也学习在失语中生活。他感觉不到又再作画的冲动，他找不到自己的表达方式，而且他对于正在兴起的巨大时髦——当代艺术——缺乏兴趣，他的根紧紧扎在现实主义的土壤里，激起他内心情感的是形象、是记忆，而不是标新立异的观念。

于是他成了纽约的一名游荡者，他喜欢这城市的无边的宽容。他在美术馆里临摹，参观画廊，偶尔参与社交活动，和街头艺术家相识，他充当来纽约朋友的导游，陪着来玩的罗中立在第五大道上拿大顶，在大都会博物馆抽烟时，他有一次碰到路过的伍迪·艾伦牵着他女友的手路过，还有一次他一家小画廊里迎面撞上了安迪·沃霍……

这是个自我荡涤的过程，他在逐渐学习如何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如何与自己的相处，这种经验是在人群与运动中长大的他那一代人，很少体验的。

在最痛苦的时刻，叔本华抚慰了他：“我突然发现，哦，生命一点意思也没有，从那以后就好多了，然后读叔本华，发现他妈的就这么简单，种种得失都放下了。当然焦虑苦恼肯定会有，但是情绪的那些东西都离开我了。”叔本华的虚无情绪，或许让他想起了 1966 年那些无所适从的日子。

也是在这种疏离与寂静中，中国的主题却意外的回到陈丹青的内心。在中国时，他一心要寻找欧洲视角，而在美国，他却发现原来中国的传统是如此丰富。他发现了董其昌的魅力，“带着全套的油画工作钻进他管辖的水墨山林中”，在接下来的年份里，他还将不断被中国昔日的艺术成就所震惊。

7 年的纽约生活给予他的另一个重要启示是，你要肯定自己的经验，它是你重要的资源。于是，他开始将正在发生的新闻，和他昔日的对欧洲油画记忆，放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他开始画三联画、四联画，甚至是十联画。这些画作曾给予他巨大的激情，但是它们始终安静的躺在他的画室里，它们从未被展出过，也很少有人看过。

在中国，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过渡是以突然截断的方式完成的，而在纽约，陈丹青的方式则自然与平静得多。他熟悉了这里的空气、味道、节奏和颜色，喜欢上与自己相处，而且有

更多的中国艺术家正涌来，他也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除去绘画，他还开始练习写作，阅读生涯打开了他的另一重视线，更何况，他还遭遇了另一名在纽约游荡的人，那个不会拒绝学英文、沉浸在现代汉语之中的木心成为了他在文学、思想上的启蒙者。或许，也是通过木心，他还产生了一种对民国时代中国的浓浓的乡愁——那时的中国人，根依旧未断。

五

“2000 年 2 月 9 日，严寒，大晴。我从肯尼迪机场启程回国。飞机轰然升空后，我临窗下看，与纽约默默告别。”陈丹青在 2007 年新版的《纽约琐记》中写道。他在这个城市中住了 18 年，他的全家已搬到此，他最终还是决定回国。

吸引到回来的，是乡愁，还是又一次对现状的逃避——他厌倦了纽约局外人与旁观者的生活？18 年间，世事沧桑。1982 年他离开中国时，满耳仍是李谷一颤微微的“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而现在谁还记得李谷一？然而很多人仍记得《西藏组画》，所以清华大学的美术学院希望他能回来任教。但是，他也看到了，作为画家的陈丹青给人的记忆，似乎仍停留在 80 年代初，他在 90 年后的新探索，画书、三联画，很少有人知道。而在中国当代艺术的版图上，他文革时的兄长与朋友陈逸飞，已经完成了多次的转型，他从革命情怀到了江南水乡，如今又变成了电影导演；而比他更晚来到纽约的徐冰、谷文达、蔡国强，则已经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而陈丹青将以何种面目再度登场？

昔日的幽灵无时无刻不在。“我没有那种为别人的承认的焦虑”，陈丹青说。在某种意义上，他的确早已经体验过名声的喜悦，23 岁画出了《泪水洒满丰收田》，27 岁则已是《西藏组合》的作者。他也声称 10 年以来，很少受到内心折磨，他获得了某种平静。

我不能确认是否当真如此。他坐在我对面，缓缓的谈话，一根接一根的抽细长的大卫·杜夫香烟。之前，他耐心被时尚摄影师摆来弄去，夸其中一位摄影助理的好身材，分明是个温和、宽厚之人。

之前的整个下午，他正在将石涛的画册绘到画布上，这幅新“画的书”，将在慈善晚会上被拍卖。

不知是否他作画已疲倦，还是他只吃了一个三明治能量不足，或者是我的问题不够有趣，他一直诚恳却不够兴奋的回答着，夜色从黑到特别黑，但他耐心却从未减弱过。窗外的铁轨不时有火车经过，巨大的声响经常淹没他的谈话。

稍作休息时，他给我们看他的画作，然后把音响的声音调大一些，正是勃拉姆斯一段旋律，悲怆而崇高，充盈了整个画室。而裹在松垮垮的黑色褂子中的陈丹青，则像是幽灵一样在空空荡荡的空间里游荡着。“对，我们是不太有这种情感”，他这样评价这段曲子，“据说崇高是来自于恐惧，你觉得呢？”

我不置可否。我觉得在四个小时的谈话里，我神经一直没有真正放松下来。他此前两次的印象、还有他的文字，要温和耐心得多，偶尔电话打进来，他则耐心得像个好好先生。他说自己正在被人情网络所吞噬，尽管不再教书，他仍要帮助学生找工作，帮助过去的老朋友办画展，还有一直不停的媒体采访，偶尔，他还要帮助一些受他“误导”的年轻人——一个南方青年因为他对教育体制的痛骂，而退了学，他要帮他写推荐信去欧洲读书……

但是，我仍觉得无法和他进入更深入的谈话，我想知道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或许，因为我不懂艺术，这样就等于错过了他身上最重要的一部分东西。或许，这是他习惯性的保护自己，他喜欢谈论外界事物，而不是他自己。对前者，他可以运用才智，而不太触及内心。

此刻的中国，有太多的外部事物可以谈论。当他在 8 年前回到中国时，肯定想不到他即将展开的新旅程，就像他日后所写的：“记得三峡大坝接近完工、京城的五环路才刚开通，申奥结果还无公布，电子游箱犹未普及，博客更是多年后上市的新把戏……《上海宝贝》的作者正当大红大紫，少年歌迷尚不知周杰伦何方神圣，八零后才俊还在大学用功……小小美术界，千禧年那届双年展是为当代艺术正名的信号，京城的前卫盲流被驱赶的生涯初告缓和……所谓教育界，世纪初适值全国重点大学的庞然合并和行政升级，当初我初识中国教育现状而少见多怪，格外伶俐的学者们则各个悄然欣喜，竟相关起门来着手又一轮权力洗牌与利益瓜分。”

他的青少年时代是一个封闭无知岁月，当他回望八十年的文化热时，又说它是仅仅是“恢复了一点残破走样的记忆”，是“瘫痪病人下床给扶着走，以为蹦迪呢”，他曾经热烈赞扬 90 年代开始兴起的个人表达与个人空间，但他真的在 21 世纪初回到中国时，则发现个人、体制与社会已经迅速庸俗化、八十年代的热忱、纯真反而变得弥足珍贵……

媒体文化、大众文化则已无比昌盛起来，三十年前，人们没有渠道表达，而现在人人都有很多话可说，却不知自己说的尽是无用的垃圾。

而陈丹青则像突然被卷入了层出不穷的争论中，他敏锐的感受力、他阅读过的书籍、他刻意寻找的表达方式，突然爆发出巨大的能量。30 年前，他用法国人的视角来对抗苏联的僵化传统，而现在他则用多年游荡积累的常识、用民国白话文的传统、用少年时说粗口留下锐利，来刺破这个迅速膨胀、思维混乱的时代。

或许他的精神资源并不充沛，不外乎是对往日传统的追忆，对已被认同为常识的强调，但是由于他的敌人目标实在过分显著与愚蠢，不管是那不断扩充的城市、不断官僚化的教育机构，还是不断庸俗化的精神世界，所以他仍刀刀见血。在这些鼓舞他的精神力量中，鲁迅再度鲜明的站了出来。

陈丹青再度回到了过去一个世纪知识分子、艺术家们的传统。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悲剧、不断堕落的中国文化图景。他们用各自的方法，来改变这种现状，但却始终发现，他们力量微弱。

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生活在西方的阴影之下。我们模仿他们，不断自我反省，却发现这种反省并不奏效。鲁迅哀叹、讥讽“吃人的传统”，但是当陈丹青成长时，这些传统已经夭折，但此后并未出现一个新世界，相反的，失去了传统的人，在以更高速度的堕落。他不断碰到类似的困境，在他年轻时，他需要打破封闭、需要更多的信息，但他再度回到中国时，他发现尽管面对如此多的信息，年轻人的头脑却以另一种形态封闭着……

他继续求助于传统，求助于记忆，求助于常识。他不断引用着约翰·伯格的名言：“一个被割断历史的民族和阶级，它自由的选择和行为的权力，就不如一个始终得以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之中的民族和阶级，这就是为什么——这也是唯一的原因——所有过去的艺术，都是一个政治问题。”他重复着民国的精神，民国人的面孔与风范——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与进步之后，人的质量反而降低了。

六

对我来说，此刻的陈丹青，有点像是马修·阿诺德在 19 世纪末的英国所扮演的角色。阿诺德目睹了英帝国的兴起，中产阶级庸俗的价值观、物质主义，支配了维多利亚时代，他试图

通过古希腊传统，来恢复英国社会的贵族精神、对精神世界的追求。阿诺德的批评被形容成“矗在艺术、政治与社会政策的血腥十字路口”。

而陈丹青呢？你当然不能苛求他的知识背景与思维深度，他自己早已承认，他是断层中的一代，缺乏足够情感与知识背景，去企及更高的地方。他也没有打破语言的壁垒，去进入更大的思想与知识空间。但是，他的方式却是相似的。在我们谈话时，他再次提到了，这个时代需要“新的语言”，“新的感受力”，三十年前，他为中国的美术界寻找某种“新的语言”，而今他在公众中的广受欢迎，仍依赖他与他在文字中的“新的语言”。

当然，他没有马修·阿诺德式样的道德与伦理热忱，他将诗歌、文学视作新的宗教形式。这使得陈丹青的表达，充满快感，却可能变成了某种漂亮的表演，它锋利，却不温暖与鼓舞。我不知道在那他内心深处，是否存在着某种持续的信念。而人类的辉煌，经常是依靠这种信念而不是头脑达成的。

但是，对于这一切，我怎又好意思苛求？陈丹青喜欢说，他喜欢此刻的中国，是因为它“充满剧情”，回想他所走过的 53 年里，在他那一代人并不稀奇，但倘若和其他国家人的相比，那么这实在是过高的密度了。而且，这些变化中，只有很少情况下是他们主动的选择，大部分时刻，他们是被裹挟在更大的社会变动中，他们中只有极幸运的才能一直跟随自己的志趣。同时，他们又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漫长、庞大、被各种网络交织的社会中，他们的个人很容易被吞噬其中，既浪费了精力与才华，又淹没了自我。

此刻的陈丹青正在犹豫，是在中国继续观看这“精彩的连续剧”，还是回到纽约重新找回那个安静的自己。

我不知作为画家的陈丹青的生命是否已经结束，或是未来的历史将怎样记录他？或许他对此并不关心，在他深夜独自作画与听音乐时，想必叔本华经常跳跃出来吧——他试图用坦白承认人生的无意义，来面对人生注定的孤独与无根。我很想知道，这种方法是否真的有效。

（许知远，许知远，作家，著有《醒来》、《祖国的陌生人》和《中国纪事》等。原文链接：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727768.html>）

[【返回目录】](#)

9-6 张柠：奈保尔：想象的故乡和《印度三部曲》

“即使到了今天，尽管时间扩展了，空间收缩了，而我也已经在那个曾经被我看成黑暗的地区，神志清明地旅行过了，但那团黑暗依旧残留着——残留在今天的我再也无法接受的那种人生态度、那种思维和看待世界的方式中。”



故乡是文学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由此派生出的诸多的母题，比如记忆、感伤、乡愁等等，实际上是“时一空”变化母题的心理替代或文学化形式。但是，每个时代“时一空”变化的方式、速度和结果都不一样，它改变着我们的心理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正是那种新旧经验冲突的产物，当然也包括对这种经验冲突的原因的探究。

在农耕文明时代，文学中的“故乡”主题几乎是一成不变的，或者说，它的心理基础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只是意象、韵律、节奏等形式主义的东西。贺知章《回乡偶书》中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老年时回到故乡，发现它还没有多大的变化，这在今天几乎是不可能的。如今要不了几年，故乡就会变得面目全非。故乡的土地被商人买去建高尔夫球场和度假村了。失去土地的乡亲，像蟑螂一样涌进城市，住在像奈保尔笔下的孟买贫民窟一样肮脏、发臭、拥挤的出租屋里。当你找不到故乡的时候，你难道不着急吗？你还能用意大利美声唱“啊，美丽的故乡啊”吗？还能说“岸草这么青翠，流水这般嫩黄”吗？

故乡不会终生伴随着我们，它瞬息万变，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的只是一些残片。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残酷事实。“故乡”的迅速消失，成了那些住在“地球村”里的人的一桩共同的心病。如果你一直没有机会回去看看，这些故乡的记忆残片就会凝固起来，变成你记忆中最珍贵的私人收藏物，它常常会成为你把玩、抚摸的对象，成为你美化“故乡”的原料和心理根据。

其表达方式就是“抒情”，也就是将对象当成不变的整体，甚至将它置换为一个“符号”，比喻为“母亲”，占据道德制高点。

比如著名的《乡愁》：“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还有《乡愁四韵》：“给我一瓢长江水/酒一样的长江水/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给我一朵腊梅香/母亲一样的腊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土的芬芳……”这种对故乡的表达，是一种皆大欢喜的表达，自己很开心，“母亲”和故乡人民也很高兴，但高兴之后，乡“愁”依旧。

今天，我们还能经常见到这样一种作家，一见到“故乡”，或者一提到“故乡”二字，他就当众鼻子发酸乃至热泪盈眶，并肆无忌惮地将这些煽情的内容写进作品，在形式上毫无节制（就形式而言，文学就是一种节制的技艺）。不节制，既不符合中国传统礼仪（《礼记》规定，即使奔丧时哭泣，也要“避于朝市”），也不符合现代文艺学对“情感与形式”辩证关系的要求。我只能把它看成是一种文学化的“自恋”甚至市场里的“谎言”。

另一种对故乡的表达，就是将对故乡的热爱和眷恋深深地埋藏在心底，而对那些将“故乡”的美好毁掉的东西进行严厉批判，其方式就是“叙事”。当内容涉及童年记忆的时候，它常常是“美好”的代名词，这是每一个人内心都具有的要求。一旦涉及故乡的现实生活时，它往往就成了批判的对象。鲁迅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在世界文学范围内，几乎所有近现代以来的作家（比如哈代、果戈理、安德森、福克纳、马尔克斯、奈保尔等），都会因古老的故乡在现代化进程中变得面目全非而痛心疾首，从而产生批判的冲动。这不是抒情，而是一种成人的叙事，是“介入”故乡现实的良知和冲动。

一个在异国他乡出生的孩子，从小就听外祖母对他说：有一个曾经哺育过你的奶妈，如今生活在遥远的、贫困的乡村，长大之后你一定要去看望她。幻想中那个慈祥的奶妈形象和一个探亲的愿望，一直伴随着这个孩子的童年……到了三十多岁的时候，他就去遥远的乡村看望他的奶妈，但所见所闻（衰老、丑陋、贫困、愚昧……）彻底粉碎了他的梦想。如果他只是一位普通人，这件事也就很容易了结（请她吃顿饭，给她一些钱）。但他偏偏是一位作家，他感到愤怒、失落，甚至有受骗的感觉。为什么会这样？是谁使她这样？她甘于这样吗？于是，他如实地写下了他关于“故乡”的见闻和思考。

2001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一生数次造访他的“故乡”（祖籍）印度，写下了三部长篇“游记”（即《印度三部曲》）。其中《幽暗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出

版于 1964 年，是 1962 年整整一年，他初次访问印度时留下的强烈印象的结果。《印度：受伤的文明》出版于 1977 年，实际上是对第一次见闻的深层思考：为什么一个曾经如此辉煌的文明，在经历了近千年的文化冲突之后，如今已经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却完全丧失了创造力，甚至不堪一击？《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出版于 1990 年，主要是写印度最大的城市孟买的故事，在这座由传统和现代、信仰和欲望、贫穷和富裕、摩天大楼和贫民窟“拼贴”而成的城市里，我们看到了一具古老文明的躯体，在现代化过程中痛苦地爬行和抽搐。

《印度：受伤的文明》和《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写得有点儿艰涩、拖拉、无趣，这当然与奈保尔（叙事者）遭到批评之后的有意“隐退”有关。但是，写作这两部作品时的他，恰恰变成了一个“他者”。相比之下，《幽暗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是作家创作进入旺盛时期的作品，写得才华横溢、犀利无比，处处充满了惊人的发现，也充满了尖锐的甚至是尖刻的批评。更重要的是，他将自己视为其中的一员（“我是它的远房子孙”），他积极地介入“故乡”的现实，因而，叙事中充满了爱恨交加的个人情感。但奈保尔却因此遭到了严厉的批评，有人认为他在书中所记录的东西（“一种不加批判，并经常是捏造的解释历史，解释贫穷、偏见、迷信、种姓、残忍、虚伪、道德败坏”的成分），伤害了民族情感，有“西方中心思想”的残余，就像一位殖民者的视角。奈保尔没有过多地辩解，他只是认为自己的故乡之行“是一个令人感伤的经历和体验”（见“奈保尔专题”，载《南方周末》，20011019），自己关于故乡的写作，是一次对“个人不幸的记录”。读完《印度三部曲》之后，我对奈保尔的说法表示理解。奈保尔当然也做了自我批评，他表示自己对“故乡”文化的理解还不够透彻，还需要继续努力学习，深入体验生活。“三部曲”的后面两部，就是他继续努力的结果，但没有第一部那么真实感人，看似公允的语调消解了叙述和批评的力度。

奈保尔的确是一直在寻找一种对自己故乡的合适的表达方式——从细节、情感到文体形式。关于自己的“故乡”，奈保尔之所以没有采用“小说”形式，而是采用了“游记”形式来表达，是基于他对“小说”这种西方文体的本质的深刻理解。那种建立在“个体”基础上的、对此时此地现实生活关注的文体，是全球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它与印度文化传统和现状格格不入，印度社会或文化的“主人公”（“个人”）尚未分化出来，它依然是一个整体，一个受伤的、悲剧性的整体。将它们黏合在一起的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一种信仰。外来文明（西方文明、阿拉伯文明）就是要去掉这种将它们黏合起来的传统。在殖民统治时期，这种

传统信仰还在挣扎、抵抗；独立之后，对手突然消失了，人们被一种来源于自身的神秘的欲望之手拽着盲目前行，殖民文化已经在人心内部形成了一种可怕的惯性。

关于印度本土当代作家，奈保尔在接受英国《文学评论》采访时说：“我由于先人而对印度十分亲近，我在一个充满印度文化氛围的家庭中长大，那就是我的世界……那些人并不了解印度农民，他们是中产阶级。我认为即使是现在仍然只有很少的印度作家了解农民的生活……我开始了解印度的不幸本质……因为中产阶级，自我欺骗的印度人不会那样思考。”（见“奈保尔专题”，载《南方周末》，20011019）。奈保尔认为，印度本土作家模仿西方写下的那些小说，也是印度殖民文化的一部分，其特点就是“模仿”，就像孟买与新德里的街道、大楼和生活方式中无处不在的“模仿”一样。所以，我并不认为将奈保尔的这三本书称之为“游记”是恰当的。我认为它还是“小说”，只不过小说的“主人公”发生了变化。《印度三部曲》的主人公就是作者的“故乡”印度，或者说就是一种“古老文明”及其命运的演变：从“传统的印度”到“现代性的印度”。这个“主人公”（印度）正处于裂变的过程中——真正的“个人”尽管尚未出现，却有来势凶猛的势头，传统文化的“整体性”已经显露出了分崩离析的趋势。这正是《印度三部曲》的中心主题。

现代生活使“故乡”的概念变得如此复杂，并对作家的能力和智慧构成了挑战。所以，并不是紧挨着故乡你就能够写“故乡”，并不能说“爱”故乡你就了解“故乡”的本质。实际上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很盲目的。对“故乡”的叙述，是对关于“故乡”的经验和想象（记忆）的重新整合，它类似于一种“完形心理”的作用（或者说想象对现实的修正）。对现代城市的叙述则没有这种要求，城市本来就是一堆变化无常的碎片，像我们小时候玩的“万花筒”。由于篇幅的原因，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不打算涉及城市精神的问题。关于城市灵魂的混凝土性质和无根状态，它与乡村（泥土）文化之间的本质差别，以及它对个人的精神意义，可参阅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

事实上，我们现在面对着三个不同意义的“故乡”。第一个是“现实的故乡”。它就是你亲历过、生活过的乡村，是泥土、劳动、乡音，是祭祀仪式，是婚礼和葬礼上的哭闹声和喧嚣声。它有一种与土地（蕴涵着死亡和不朽双重意义）相关的本原意义。第二个是你从没见过过的“故乡”，它不过是你从长辈那儿听说过的一个地名，它可能成为你“想象中的故乡”。这种“想象”的本质，是对“你来自何处”这一根本问题的无意识追寻，是你黑暗意识中的唯一的一丝光亮。第三个是作家笔下的故乡，也就是“被叙述的故乡”。它是一种补偿，对失去的完

整性的一种补偿。这三种意义上的“故乡”可以作为辨别身份的三个条件：其一，只满足第一项条件的人是农民；其二，只满足第二项条件的人是市民；其三，具备一、二两项的是进城农民；其四，具备一、三两项的人就是小说家；其五，具备二、三两项的人可能是一位浪漫诗人。如此判断，我自己属于第三种人，一个有文化的进城农民。我的儿子则属于第二种人。

奈保尔应该是幸运的，因为他同时拥有上述三个意义上的“故乡”。一个是“被叙述的故乡”（他的作品《印度三部曲》）。一个是远在大洋彼岸的“想象中的故乡”，通过外祖母的讲述存留在他的想象中。还有一个“现实的故乡”，不过奈保尔的这个“现实的故乡”有点特殊，它是特立尼达的一个印度移民小区。在那个相对封闭的小区里，还保存着很多印度文化和传统习俗——食物、器皿、家具、生活习俗、语言等。这些习俗和传统，是顶着不同小区文化之间冲突的巨大压力而保存下来的。那个遥远的“故乡”印度，一直是作家童年时代的一个梦幻，它支撑着他的想象，并为现实生活的各个细节提供注解。奈保尔说：

小时候，对我来说，养育过我周遭许多人、制造出我家中许多器物的印度，是面貌十分模糊的一个国家。那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把我们家族迁徙的那段日子看成一个黑暗时期——从大海伸展到陆地的那种黑暗，就像傍晚时分，黑夜包围一间小茅屋，但屋子四周还有一点光亮。这一圈光芒、这一个时空，就是我的经验领域。即使到了今天，尽管时间扩展了，空间收缩了，而我也已经在那个曾经被我看成黑暗的地区，神志清明地旅行过了，但那团黑暗依旧残留着——残留在今天的我再也无法接受的那种人生态度、那种思维和看待世界的方式中。当年，我外祖父鼓起勇气，从事一趟险阻重重的航程。生平第一次离乡背井，他面对的是一个崭新、令人惊愕的世界，包括那个距离他那座村子好几百英里的大海；可是，不知怎的，我总觉得，一旦离开家乡，他老人家就不再观看这个世界了。后来，他曾返乡，但只是为了带回更多印度的东西。在特里尼达，为我们家兴建一栋住宅时，他拒绝参照岛上各式各样的殖民地建筑物，而是自己动手设计蓝图，建造出一间笨重、平顶、怪模怪样的屋子，而这种房舍，日后我在印度北方邦那些残破的小镇会一再看到。外祖父他老人家遗弃了印度，然而，就像金牙婆婆，他也弃绝特里尼达。可是，他却能够脚踏实地地活着。他那座村子外面的任何事情，都打动不了他的心；没有人能逼迫他的内心世界。不论到哪儿，他都随身携带着他的村庄。一小群亲友，加上几亩土地，就足够让他老人家在特里尼达这座岛屿中央，心满意足地重新建立一座东北方邦村庄；在他心目中，这儿就是辽阔浩瀚的印度大地。（英）奈保尔：《幽黯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10页，北京，三联书店，2003。

这个“经验的领地”，正是奈保尔从未涉足过的故乡印度。这里包含了“想象中的故乡”的全部含义，但它依托在一个特殊的“现实故乡”之上。

当奈保尔站在真正的故乡印度面前时，他发现“现实的故乡”（经历了殖民化之后）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成了一个文化大拼盘——印度教的（还包括它的各种分支）、伊斯兰教的、西方文化的，还有一些“拼贴”而成的“四不像”文化。其“印度性”甚至不如远在海外的特立尼达的印度小区那么纯洁、透明。但是，特立尼达印度小区的“印度性”，并不是一个自足的东西，它建立在对“现实的印度”的缅怀和遥望之上。没有那个真实印度的存在，特立尼达印度小区的“印度性”根本无法想象。在奈保尔一生频繁的迁徙生活中，这两个“故乡”在不断地交叉变换，互相补充和诠释。

奈保尔说，印度和外祖父那一代迁移海外的农民“是我的根”。对故乡的追寻、理解和表达就是一种特殊的“寻根”方式。然而，“印度”在哪儿呢？“故乡”在哪儿呢？它可能只是你心中的一个梦幻。奈保尔发现，真正“现实的印度”并不存在，它成了那个叫“印度性”的观念。所以，“印度性”是完整的，而“现实的印度”是虚幻的。因为印度古老的时空观已经没落，古老的信仰体系也已经崩溃，被一种“世俗的、同质的、空洞的现代性”所取代，“人”正在分离为“孤独的现代人”。如今的“故乡”，看来真的像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谈到“民族”概念时所说的那样，只能是一个心理学意义上的“社会事实”，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奈保尔在《幽暗国度》的结尾说：“印度精神悄悄地从我身边溜走了。在我的感觉中，它就像一个我永远无法完整表达、从此再也捕捉不回来的真理。”（〔英〕奈保尔：《幽暗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403 页，北京，三联书店，2003。这些话好像是对着我们说的一样。）

（本文节选自：张柠：《白垩纪文学备忘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

（张柠，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白垩纪文学备忘录》、《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等。

原文链接：<https://cochina.org/2013/02/奈保尔：想象的故乡和《印度三部曲》/>）

[【返回目录】](#)

【现】

9-7 于坚：我们像灰尘一样被赶到了大地上

“如果一个社会永远不讲守陈只讲破旧立新，那么住在里面的人永远不会有安全感，如果人直到 80 岁还在搬家，我觉得那太恐怖了。丧失了故乡就是丧失了安全感。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可能就永远在灰尘滚滚里度过了。”



口述/于坚 整理/丁晓洁

我说过，我是在故乡被流放的尤利西斯。

尤利西斯被流放，被迫离开自己的故乡，但在我们现代社会，即使每个人都待在自己的故乡，过去生活的世界也完全不见了。

我们重建了一个新的中国，但是当我们生活在现代化之中的时候，我们感到空虚失落，我们发现自己依然割舍不掉对故乡的怀念，我们发现自己非常需要过去那种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感到充实的经验。

“汉语是我最后的故乡，朋友是我最后的故乡”

我在上世纪 80 年代写诗的时候，就开始有对故乡的失落感了。但那时候是很淡的，只是感觉到这个世界在变化，感觉到童年世界的消失。不像今天这么强烈，今天整个故乡世界完全被摧毁了，面目全非。

我在昆明，现在出去经常找不到路。它变得和中国所有的城市一模一样，我常常不知道自己身处哪里，有一种丧失了记忆的感觉。我对昆明是一种依赖感，它就像母亲一样庇护着我，但是这个母亲已经越来越弱了。不仅是对于我，其实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你生活在故乡，但是你完全不认识这个地方。这种陌生感是强加给你的，强迫性地使你变成一个陌生人。

过去之所以选择留守在昆明，是因为我喜欢这个地方，这里有我的记忆，这里给我写作的灵感。故乡诗人更愿意守陈，更愿意相信来自传统，来自“天、地、神、人”四位一体对他的庇护。故乡是什么？它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是过去那种使你安心的生活经验。具体表现为各种建筑方式和生活方式，你的乡音和你的衣着、你的饮食习惯和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这些和别的地方都是不一样的。而现在呢，所有的故乡都被拆掉了，地方性知识被消灭掉了，所有的人都差不多了，也许只有语言和住在那个地方的人还留着最后的记忆。如果昆明这个地方不是因为我的父母和我的朋友还住在这里，我想不出还留在这里的理由。为什么一定要住在昆明呢？我住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因为都差不多。所以我说：汉语是我最后的故乡，朋友是我最后的故乡。

“今天中国丧失了故乡的生活方式很像集中营”

一般人认为故乡丧失的就仅仅只是建筑，但并不仅仅如此，故乡丧失的是建筑里面的那种生活方式。过去昆明的建筑都是小街小巷，人在里面的生活是非常亲和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那时候的昆明有很多小铺子和小商店，有很多寺庙，有很多水井，生活在里面你不会感觉到无聊，人生非常丰富。

我只能通过我的作品来重建我的故乡，我的故乡现在只能建立在纸上了。更重要的是，过去的中国文学所表现的那个世界，已经完全没有对应物了。年轻一代再读中国过去的那些文学作品，他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我在上世纪 80 年代写的那些关于滇池的诗，现在年轻一代读起来就像是谎言一样，因为今天的滇池已经不是我写的那个滇池了，今天它是一潭污水。

我们写的那种过去时代的爱情，男女之间那种美好的关系，今天也不存在了，什么两小无猜，什么青梅竹马，哪里还有这种事情？青梅竹马是一种长久做邻居才能产生的关系，如果你总是搬来搬去，你总是住在陌生人当中，怎么可能有青梅竹马呢？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的社

会，大家互相都不认识，我们在单位上仅仅是大家在一起挣钱而已，挣完钱各回各家，谁都不知道谁住在哪里。现在我很多的朋友，他们连隔壁住的是什么人都不知道。

这种陌生人社会可能在西方很适合，因为西方本来就是个人主义的社会。但是中国的传统是群体性的，人在这个陌生人社会里面就感到非常孤独。把中国传统故乡结构解体之后，这个社会要走向一个什么地方，是非常难以预测的。我非常担忧：现在这种完全西方式的小区，能使未来的中国人有幸福感吗？

我去过很多西方的国家，他们的小区虽然是以个人为单位的，但是它有教堂维系人心，把大家在上帝的名义下团结起来。而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去推进西方式的社区，最后就是一盘散沙，大家完全丧失了联系。现在中国生活很无聊就是这样——在大楼的公司里上班，下了班开车去超级市场购物，然后回家看电视。生活的细节完全消失掉了。再加上城管再把那些小贩小店全部赶走，菜市场、庙会全部消灭了。今天中国丧失了故乡的生活方式很像集中营。

故乡是精神和空间天人合一的一个世界，它是一种诗意的栖居。现在新的小区只是一些商品房，住在里面你想的是房子会不会增值，完全没有诗意。

“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可能就永远在灰尘滚滚里度过了”

我们身处一个从乡土中国向现代化中国转型的时代，过去的中国是建立在故乡基础上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在路上”的社会。故乡在文化上就已经被否定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就是这样教育大家的：故乡就是阿 Q，就是落后的，就是没有希望的，生活是在别处的。在过去，“别处”在西方，很多人都要跑到国外去发展，背井离乡，结果现在中国大量的故乡都人去楼空，又面临着拆迁，大家都变成一种“生活在路上”的人了。年轻人愿意在路上，但你走到中年走到老年，你走不动了怎么办？惶惶不可终日。

抛弃故乡的这种疯狂的运动，在世界上是非常罕见的。西方也进行现代化，但是它也保持着传统的生活经验。到了国外你会发现，所谓故乡的这一面是大面积被保留着的，现代化和故乡是并存的。它用的是加法，而中国用的是绝对的减法。去年我去法国和美国旅行，认识了一些西方的诗人，他们就住在小时候出生的房子里，而且甚至是三代祖传的房子，他们住的房子

是几百年前的祖先就住在那里。这使我非常吃惊，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没有人还住在他出生的房子里了。我们不断地搬家，我们已经像灰尘一样被赶到了大地上，居无定所。

我也不是乡愁，我是感到一种无可奈何的痛苦。我只是觉得，现代社会从来没有反省过：我们所丧失的那个故乡，确实是必须被抛弃的吗？故乡所提供的生活经验是“人应该怎么存在着他才会感觉到幸福”。这是每个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历史慢慢形成的经验，中国人几千年来生活在四合院里，生活在人和人关系非常紧密的城市里面，今天你把这种经验摧毁了，最终会使中国成为一个无根的民族。

我对于中国故乡未来的走向是绝对悲观的。大家都想把一个地方改造成新加坡、改造成澳大利亚、改造成美国，没有一个人的主旨是按照中国过去的故乡用现代的材料来整合的，完全就是照搬西方。昆明现在的口号是“要把昆明建造成一个新加坡”，而且是每时每刻都在这么看，现在的昆明就像北京一样，街道越来越宽，到处都是高楼大厦，人在里面像过街老鼠一样。过去中国传统中城市的亲和力已经完全消失掉了。

故乡已经被折腾得差不多了。也许有一天会有一种反思的力量兴起，有可能要来重整今天的这个生活世界，但是这种“拆完再建、建完再拆”使人感觉绝望。如果一个社会永远不讲守陈只讲破旧立新，那么住在里面的人永远不会有安全感，如果人直到 80 岁还在搬家，我觉得那太恐怖了。

丧失了故乡就是丧失了安全感。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可能就永远在灰尘滚滚里度过了。

2009 年 7 月 23 日星期四

（于坚，当代著名诗人。丁晓洁，《新周刊》记者。）

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00756601017lvh.html）

[【返回目录】](#)

9-8 熊培云：谁人故乡不沦陷

“没有谁愿意抛舍自己童年时的家园，没有谁愿意故作忧伤。尽管我所谈论的村庄原来也几乎一无所有，尽管它现在也在生长希望，然而，当我看到故乡沦陷的种种，并且为此伤感时，我总是同样忍不住去想——笼罩在普通中国人身上的最真实的黑暗与无奈，不是遥远非洲的某场屠杀，不是地中海东岸的冤冤相报，甚至也不是外国势力对本土势力的覬覦，而是这片土地上的不受约束的掌权者与谋利者，无论其权力与胃口大小，只要不被约束，他们就会不断地践踏与蚕食每一座城市、每一个村庄，沦陷每个人的故乡。”



“当我离开摇篮，世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大约在两百多年前，当夏多布里昂回到布列塔尼故乡时，曾经这样感慨。因为作家再也寻找不到“儿时的圣马洛了”，小时候曾在船舶的缆索间玩耍，现在港内看不到船了，而自己出生时的公馆也已经变成了旅店。

作为一个异乡人，我曾经在一个雨水涟涟的季节穿行圣马洛。记得当时圣马洛好像正在举行一场帆船比赛，满街都是敲锣打鼓的人，热闹非凡。这样的時候，尤其像我这样一个喜爱欣赏沿路风景的人，即使有些离愁，也是很难体会夏多布里昂笔下那种“望不见童年”的伤感的。

显然，这种伤感只有你失去了自己的故土时才可能有刻骨铭心的体会。和夏多布里昂不同的是，在我的伤感里不仅有失去故土的惆怅，更有失去故土的羞耻，而且是在一个莺歌燕舞的和平年代里，没有战争，没有手握刺刀一进村就抢鸡的敌人。

我在《寻访罗曼·罗兰》一文中曾经慨叹老家的旧宅在移民建镇的风潮中被拆除。然而事实上，在我的世界里，此后几年老家发生了比拆房子还要严重的事情。那就是村子里的一些古树被树贩子连根盘走。坦率说，尽管我也时常遭遇人生的挫折，但却很少失去内心的安宁，然

而当我偶然知道老家的古树早在几年前便被人强卖一空，其时内心不可不谓翻江倒海、肝肠寸断。

显然，在我所有的乡村记忆里，最牵动我的故乡之物，便是村庄公共晒场上的一棵老树。它高大挺拔，有几十米高，不仅给人昂扬的斗志，同样是贯穿这个村庄的几百年历史；它同时也是一种温情，是游子望乡的归所，就像《乱世佳人》里陶乐庄园里的树，没有树，再肥沃的土地也没有灵魂。我时常想，就像方尖碑之于协和广场，艾菲尔铁塔之于巴黎，即使是出于审美考虑，这棵树之于这个村庄的价值也无可比拟。然而，树贩子竟以“2000 元”的价格将其买走。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经与父母在田间地头忙着“双抢”，边收割水稻边听崔健的《一无所有》，而现在，虽然表面上我在城市里过得意气风发，然而我却失去了心底的家园。我曾经看过一部名为《柠檬树》(Lemon Tree)的以色列电影：一位巴勒斯坦女果园主，为了保卫自己的果树，将自己的新邻居、以色列国防部长告上法庭，因为以色列当局出于安全考虑要砍她的果树。然而，在女果园主看来，树有自己记忆，有生命，这些是任何钱财都无法补偿的。令人忧伤的是，我所在的村庄，竟然因为“2000 元钱”被人变卖了自己的灵魂。

这些年来，有越来越多的游子，写下了“故乡沦陷”的文字。他们站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发问——为什么我们曾经“热爱的故乡”变成了一个自己不愿回去的地方？2008 年我先后回了三次老家。第一次是在春天，年少时的一位好朋友开着车将我送回村庄。然而我在村里只待了十几分钟，因为这十几分钟已足够我去旧时的晒场看那个大坑与剩下的古树枯根了。夏季，当我排除内心的倦怠重新回到乡村，并且居住了不短的一段时间，走访了些村民，发现没有谁不为卖树之事唉声叹气，没有谁不为此“心中辣痛”。年底，人们还在谈论发生在几年前的这件事情。一位外出打工的人甚至和我谈起自己如何细心呵护树根，希望它能长出新枝。

其实谁都知道，那些曾经见证了几代人生命的树，在逝去之后就再也不会回来了。之所以有此一切，只因为当时抗议之声寥寥，每位村民都像马铃薯一样，散落一地、无依无靠。

有在环保组织工作的朋友和我说，这种古树卖到城里，好的能值一二十万元。然而，村长自作主张时却可以不顾村民的反对，以一棵六七百元的价格贱卖。当然，村民的反对也并不齐心，许多人怕“得罪人”，全然忘了村长不顾村民意见与权利，得罪诸位在先。

关于是否“得罪人”这个问题，2009 年春节时我和一位村民有过交谈，他的逻辑很值得回味：“如果我反对村长卖树，那我就和村长结了私仇，因为我的反对是针对村长个人；而村长卖树不会和我结私仇，因为他得罪的是大家，而不是针对我个人。”在他看来，同样是“得罪人”，境界还不一样。

据村民分析，这些树之所以能被强行买走，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随着城市向农村的开放，许多青壮年常年都在外打工，对村里涉及公益的事务疏于过问和了解；

二是权力部门有恃无恐，内外勾结。据称卖树之时，当地各路干部与喽啰纷纷到场，名义上是来劝说村民卖树，实为阻止恐吓持反对意见的村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村长同意卖树，也是给上级官僚做了个温顺的人情；

三是村庄小，本不足 20 户人家，任何反对卖树的声音都会显得很尖锐，很“得罪人”。

除此之外，同姓、杂姓混居也是一个原因。尤其是在近几十年，村里本姓（熊姓）与浊姓家庭各占一半，虽然平时赌起钱来其乐融融，但具体到卖祖业这件事上，浊姓人家基本上没有话事权。而且，面对这种“得罪人”的事，他们也“乐得不说话”，有的甚至“乐见其成”，当是看个笑话。

据说，树贩子当时看中了三个地方的古树。一是我在上面提到的古树，居于晒场边上，树底是村民集体乘凉议事的好去处；二是村中祠堂后的树；三是祖坟边上的树。最后，尽管遭遇抵抗，前两处的树还是被连根卖掉。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当村民们以此反对卖树时，某夫人竟痛斥村民“现在每家都有电扇了，如何还需要大树乘凉？”所幸，祖坟边上的古树被保留了下来。之所以没被卖掉，是因为有留守的壮士以祖宗之名誓死捍卫，树贩子与村干部方才罢手。

几处树的命运的不同多少有点意味深长。财产集体所有与同宗同族的文化都不足以阻挡权力与资本的合谋，倒是那几座私有的、孤零零的祖坟，为这个村庄守住了一点底线，赚得了一点尊严。谁曾想，那些曾经被视为封建糟粕的思想，竟然挡住了权力与资本之槌的联袂入侵？的确，在今日中国许多农民仍保留了一点朴素的信念，将关系到家族命运的祖坟看得和生命一样重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祖坟像私有财产一样，直接对应成每户人家的具体的权利，对应了具体的责任人。如果谁不去捍卫自己的祖坟，不仅自己觉得吃亏，同时也会被人笑话。

如上所述，我曾经因为自己生长在农村而骄傲于世，无论漂泊到怎样的天涯水涯、异国他乡，终有一方灯火可以眺望，有一片土地可以还乡。然而，因为这些古树的逝去，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时常无限伤感。2008 年夏天的乡居期前，我在庐山脚下的“白鹿洞书院”看到一副对联：“傍百年树，读万卷书。”可叹的是，和许多珍爱家园的朋友一样，我们虽读万卷书，却无力护住这百年树。

事实上，这种毁灭村庄，并非我所在的村庄才有。近些年来，这种摧折他人故乡的罪恶早在江西省乃至全中国蔓延。据新华社报道，在江西宜春，吉安市的一些乡镇，因为盗卖古树名木的犯罪分子每天都在一些村镇“走动”，部分有古树名木的村子，常常要每天派人专门守树，有些村子还自发成立护树队，每天为古树名木站岗放哨。（《古树之劫：“大树进城”背后隐藏的产业链》，新华社记者曾曦）

与此相关的时代背景是，近年来，在城市建设和改造过程中，中国各大中小城市在绿化上都加大了政府投入，努力创建一个生态良好的人居环境。城市绿化越搞越好，大树移植、古树进城现象也随之出现，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曾经有记者采访非法倒卖大树、古树的树贩子，据称大树的死亡率很高，他们有时候买进 10 棵树甚至要死六七棵。这种死亡率，让我不禁想起了当年的贩奴船。事实上，即使活下来的树，也只留下一个光秃秃的树干，成了“断头树”或“骨架树”，早已没有当年枝繁叶茂的气象。

生活在城里的人为什么要买走乡下人的树？是金钱万能么？由于了解到上述一幕幕情景以及背后的真实，如今每当我在城里看到哪个地方突然多了棵古树，我首先想到的便是——这是谁的故乡被拐卖到了这个角落？而我的故乡又被那些惟利是图的人拐卖到了何方？我至今不知，那些树是活着抵达彼岸，还是死在了甲板之下？也正是上述这些原因，城里人在移栽的古树上看到了风景，而我，只看到了偷窃、抢劫以及杀戮。

“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抛开记忆中的童年，谁能忍心看那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我时常忍不住怀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怀想那个理性与心灵的花朵并蒂绽放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歌谣。没有谁愿意抛舍自己童年时的家园，没有谁愿意故作忧伤。尽管我所谈论的村庄原来也几乎一无所有，尽管它现在也在生长希望，然而，当我看到故乡沦陷的种种，并且为此伤感时，我总是同样忍不住去想——笼罩在普通中国人身上的最真实的黑暗与无奈，

不是遥远非洲的某场屠杀，不是地中海东岸的冤冤相报，甚至也不是外国势力对本土势力的覬觐，而是这片土地上的不受约束的掌权者与谋利者，无论其权力与胃口大小，只要不被约束，他们就会不断地践踏与蚕食每一座城市、每一个村庄，沦陷每个人的故乡。

（熊培云，学者，评论家，著有《思想国》、《重新发现社会》和《自由在高处》等。原文链接：
<https://cochina.org/2013/02/谁人故乡不沦陷/>）

[【返回目录】](#)

9-9 王晓渔：我没有乡愁

“我几乎从来没有乡愁。或许，乡愁和对‘故乡’的浪漫化想象有关，但是我对‘故乡’没有想象，因为现实更具想象力。或许，乡愁和文化有关，唤起内心文化记忆的地方才是有乡愁的地方。但是，在故乡身上，我只看到了凋敝。”



“故乡”这个词，在我看来，主要适用于文艺作品。1987 年，台湾歌手费翔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的《故乡的云》，风靡大街小巷。虽然这首歌的中心思想是对漂泊的厌倦、对故乡的思念，但是对大陆观众来说，更具魅力的是“漂泊”、“游子”、“浪迹天涯”。

在一个国民都是居民的年代，让人充满想象和渴望的是“异乡”，不是“故乡”。漂泊意味着抒情、探险、罗曼蒂克，与疲惫、酸楚、伤痕无关。当时，大规模的跨地域人口流动尚未产生，旅游属于高消费，流浪乞讨会被收容遣送。能够出门的机会屈指可数，除了公务员可以偶尔“出差”，一般来说，只有高考能够提供背井离乡的终极可能。

我读中学的时候，同学们填报高考志愿，虽然要考虑重点（即一本）和非重点大学（即二本）的区别，地域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名校可以超越地域限制，比如中国科技大学虽然身处合肥，依然是理科生的理想去处。除了这种特例，同学们宁可去远在天边的非重点大学，也不愿意报考近在眼前的重点大学。比如石河子农学院一度在同学中声名显著，当时这所学院尚未与其他学院合并成石河子大学，也没有迎来支教老师贺卫方。同学们之所以对这所学校感兴趣，是因为它的分数线不高，又很遥远。如果对成绩不太有把握，又想体验浪迹天涯的感觉，报考这所学校可以满足心愿。

在《故乡的云》里，故乡具有疗伤特效，歌曲的最后唱道，“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抚平创伤”。这是文艺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被浪漫化的故乡，往往和乡愁、怀旧、田园联系在一起。但是，文艺作品中还有另外一种“去浪漫化”的故乡，鲁迅的《故乡》即是一例。“渐

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这段关于故乡的描写，我们耳熟能详。鲁迅接着写道：“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可见故乡适合想象，但不适合返回，因为返回会打破浪漫的想象。

在文艺作品中，费翔的“故乡”是主流，但是在现实中，鲁迅的《故乡》更能唤起共鸣。几年前，王怡曾经写过一篇《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这篇文章在网上广为流传，网友纷纷撰写同题文章，感慨家乡的凋敝。当然，主要是精神上的凋敝，人性之善被压抑，人性之恶被鼓励。从经济角度来看，各处似乎都是日新月异、蒸蒸日上，看不到凋敝的迹象。

《故乡》里的“我”比较幸运，因为他虽然是旧历年底回家，却不用担心春运。从“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来看，船舱还比较宽松。出于对春运的恐惧，我已经很久没有在旧历年底回家了。读大学的时候，每年来回的春运经历，不堪回首。

首先是买票难，尤其是买返程票，难上加难。几乎每次尚未回家，就要考虑返程票的问题。当地的火车站，在春运期间公开出售的火车票都是无座的（这种无座火车票，也很难买到），你有“关系”，才会有座位号。这样做，可以满足各种“关系”的需求，因为所有座位都预留给了“关系”，但是对乘客来说，就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当时没能免俗，拐弯抹角托过不少关系。

有了车票，不等于万事大吉，能否上车还是个问题。只要稍慢一步，车厢就像真空包装的罐头，填得结结实实。有一次，托了关系，可以提前上车，以为高枕无忧。火车提前 30 分钟检票，于是提前 40 分钟直奔而去。还没有看到火车，就听到喧嚣的声音，感到大事不妙，到了地方发现火车已经人满为患，只能从窗口爬进去。这是起点站，从窗口也爬不进去。为什么会这样？或许是因为提前检票，或许是因为每个人都找了关系。在家聊天，经常听到一个似乎毫无关系的人，如何把关系找到中央部委。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成功上车之后，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休眠”。一动不动（也动不了），十几个小时滴水不进（食物更加免谈），有时为了确保一路无忧，登车前几个小时就要绝水绝食。有次，一位乘客不幸要去厕所，但是几乎没有可能穿过人群，于是几位同伴把他举起，让他踩着人们的肩膀。至于他如何把厕所里的乘客劝说出来，我没有看到，至今还是个谜。

上述这些经历基本上都是十几年前的往事。现在，有些细节得到改善，比如火车票开始印座位号了，但是火车的拥挤在春运时没有变化。“关系”是生活得以运转的核心，虽然它有时显得有人情味，但是这种人情味又是经过计算的。最重要的是，个人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个人的尊严无法得到尊重，这依然是常态。我很久没有回家，却对家乡并不陌生，因为经常在媒体上偶遇。当地居民虽然信息并不灵通，但在面对“负面新闻”时总是见多识广，因为身边有太多更加“负面”的现实。

我几乎从来没有乡愁。或许，乡愁和对“故乡”的浪漫化想象有关，但是我对“故乡”没有想象，因为现实更具想象力。或许，乡愁和文化有关，唤起内心文化记忆的地方才是有乡愁的地方。但是，在故乡身上，我只看到了凋敝。

（王晓渔，文化学者、评论家，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教授。原文链接：

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1-02/22/content_450148.htm）

[【返回目录】](#)

【洞见专栏】

陶郁：进城务工农民定居意愿偏低

政府最新数据显示：2011 年，我国农民工数量为 2.53 亿人，其中外出就业 1.59 亿人。在这个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中，进城务工的农民最终选择定居城市还是返回故土，直接决定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最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学教授范芝芬(C. Cindy Fan)在《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 期刊上撰文指出：大部分务工农民并无在城市永久定居的打算，他们在进城务工的同时往往将部分家庭成员留在农村，并且在城乡之间进行“钟摆式”的往返流动；而务工农民的定居意愿，则主要取决于城市劳动力市场情况及他们对社会环境的预期。

为了摸清务工农民在城市的定居意愿及影响该意愿的因素，范芝芬委托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于 2008 年 9 月开展了“北京城中村调查”。范芝芬认为，城中村不仅是务工农民的聚居地，而较之厂区宿舍等主要供单身工人居住的地点，城中村更可能容纳家庭，从而更有利于全面研究务工农民的定居意愿。为确保研究样本的代表性，范芝芬首先从北京市域内的 867 个城中村里随机选择了 50 个样本村落，然后在每个样本村落内的不同部分分别选取有代表性的调查对象发放问卷，结果共获得 888 个有效样本。

通过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范芝芬发现有高达 45.2% 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将在未来四年内离开北京，其中更有占总数 26.7% 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可能随时离开北京。相对而言，表示具有长期定居北京打算的受访者只占调查总数的 38.2%。更有 16.6% 的受访者尚未决定自己未来的去留。

范芝芬还发现，相对于选择在未来数年内离开北京的受访者而言，具有长期定居打算的务工农民平均年龄稍低、更可能为男性、平均受教育程度更高，而且进城务工的平均年限相对稍长。更有意思的是，具有长期定居打算的受访者往往对工作和培训具有更为积极的态度和更高的评价，他们在进入城市前后的收入差距更为明显，对于同事、邻居、居委会和政府都更加信

任，并且相对较少地感知到社会歧视。不过，研究数据也显示，具有长期定居打算的受访者所拥有的亲属和朋友数量相对较少，与周边村民的互动也相对较少。

对于受访对象的婚姻和家庭状况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居住于北京城中村里的务工农民中，未婚比例只有 **18.5%**，这个指标要显著低于通过另一项先前进行的独立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范芝芬认为，这显示城中村比工厂宿舍更适合携家带口的务工农民居住。同时，有 42% 的受访对象与配偶和子女一起生活居住在北京；其余 **39.5%** 的受访对象虽然已婚，但他们要么在北京独立生活，要么只携带了配偶与子女而将其余家庭成员留在农村。而即便是那些全家来到北京生活的受访对象，往往也将农村的住宅和田地托付给老人照看。

因此，范芝芬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进城务工的农民仍将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往复流动。就定居意愿来看，在已婚但无子女与未婚的受访者群体中，倾向于在城市长期定居的比例最高；而那些将子女留在农村的夫妇，在城市长期定居的意愿则相对较低。

为进一步界定影响进城务工农民定居意愿的因素，范芝芬还通过构建回归模型对人口特征、家庭结构、工作条件和社会环境等变量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外出务工时间越长的农村人口，越倾向于在城市永久定居，而且这种定居意向与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社会信任程度、在农村的房产和耕地面积、是否接受过岗位培训和是否拥有社会保险等因素关系不大。同时，子女留在农村的受访者和对于社会歧视感受程度较深的受访者定居城市的意愿较弱，而受访者越是认为自己能从工作中提高技能和收入水平，他们就越有意愿在北京定居。

此外，与一般经验不同的是，范芝芬发现：务工农民的社会关系越丰富、社会互动越活跃，他们选择在北京长期定居的可能性也就越低。

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里所取得的巨大发展，与广大进城务工农民所做出的贡献密不可分。近年来出现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民工荒”问题，既说明了对制造业进行“转型升级”的必要性，也提醒政策制定者重视满足进城务工农民的需求。当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机制复杂而且影响深远，范芝芬的研究说明，户口制度只是影响城乡融合的问题之一，而进城务工农民究竟是否最终把将安在城市，还取决于城市能否给他们提供良好的经济收入，更取决于他们能否通过工作感知到自身劳动技能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在城乡之间进行钟摆式流动仍将成为许多进城务工农民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主要生活方式，如果期望这个群体早日成为城市的永久居民，政策制定者应当在收入、技能和社会关怀等方面对他们加以重视。

【参考文献】

Fan, C. Cindy. 2011. "Settlement Intention and Split Households: Findings from a Survey of Migrants in Beijing's Urban Villages." The China Review 11 (2): 11-42.

（本专栏由“政见”团队供稿，<http://cnpolitics.org/>）

[【返回目录】](#)

【FMN 新闻】

北京雾霾天气

本月中国的雾霾天气仍在持续，今年以来北京共出现了四次雾霾天气过程。据北京市气象局统计，从 1 月 1 日到 29 日，北京南郊观象台雾霾日数为 24 天，仅有 5 天不是雾霾日；雾霾日数比常年同期偏多一倍以上，为 1954 年以来同期最多。

新闻：<http://fmn.cc/XUhhX9>

1 月 30 日环境保护部通报称，中国部分城市空气质量仍属重度污染或严重污染状态。北京 1 月 30 日 PM2.5 平均浓度值仍高达 310 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为六级，属严重污染。通过环境保护部的卫星中心遥感监测，29 日，灰霾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等地区，灰霾面积为 143 万平方公里。

新闻：<http://fmn.cc/VoJBaw>

中央电视台的《新闻 1+1》节目中，曾在“非典”担任广东省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现任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表示，“北京十年来肺癌增加了百分之六十，空气污染是一个主因。大气污染是一个大环境，比非典可怕得多，非典可以隔离，大气污染是任何人都跑不掉的。交警的鼻咽炎比普通人多三分之一到一半以上。”

新闻：<http://fmn.cc/VoJDsp>

严重的雾霾天气也引发了高层的关注，继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也在一次座谈会上表示，“最近的雾霾天气对人们生产生活和身体健康都造成影响，我们应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推进节能减排，用行动让人民看到希望。”

新闻：<http://fmn.cc/Vp3yrb>

中国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也首度开口回应雾霾与空气污染问题，并承认中国近 20 年来集中出现了过去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段出现的大气污染问题。他表示，按照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评价，全国 330 多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近 2/3 的城市达不到二级标准要求。吴晓青又表示，发达国家耗费 30 到 50 年才基本解决大气污染问题，“要正确对待当前的大气污染形势，要充分认识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的艰巨性、复杂性与长期性，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

新闻：<http://fmn.cc/WzZq36>

央视的《新闻 1+1》中，嘉宾郝吉明表示，改善油品质量，可能是控制一种源污染物排放的全局性问题。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则在 31 日说，炼油企业是雾霾天气直接责任者之一，但这并非因油企质量不达标，而是我国标准不够，只有北京推行含硫量在 10ppm 以下的欧 V，但全国普遍为 150ppm 的欧 III，标准不提高设备改造就上不去。

新闻：<http://fmn.cc/XUcRiW>

重庆不雅视频

1 月 24 日晚，重庆市委表示，“2012 年 11 月 20 日以来，重庆市纪委在对雷政富违纪违法问题深入调查中，发现一个进行敲诈勒索犯罪团伙的线索。经公安机关侦查，2008 年至 2009 年期间，肖烨等人采取色情勾引、秘拍不雅视频等手段，敲诈数名党政干部和国有企业负责人。

检察机关已批准逮捕肖烨等犯罪嫌疑人。” 同时还有 10 名政企领导干部被免职，其中不乏一贯形象良好的官员。

新闻: <http://fmn.cc/XUhQ37>

<http://fmn.cc/XUhOsb>

1 月 23 日,《南方都市报》刊文讲述商人肖烨指挥赵红霞、张丹(化名)、谭琳(化名)通过短信与官员取得联系,经过一段时间交往后就会到酒店开房,同时女孩随身携带的包里已经装好了针孔摄像机,上床的整个过程都被偷拍。如果视频清晰、完整达到肖烨的要求,就会安排在下一次开房时捉奸,如果官员否认就会给他看偷拍的视频,肖烨到场与官员交涉,并保证“处理好视频”,斡旋之后即让官员离去。偷拍开始后,2008 年肖烨的公司开始转型,并在这些官员的主政地区获得了少则百万,多则千万的市政工程项目。

新闻: <http://fmn.cc/10V5QpB>

1 月 27 日下午,重庆官场不雅视频爆料人朱瑞峰称有 5 名重庆警察到他家中,朱瑞峰对自己的人身安全表示了担忧。重庆警方随后表示“专案组在北京警方的协助下,依法找朱瑞峰核实了解相关情况并提取相关证据。”同时“朱瑞峰有义务配合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并提供相关证据。”

新闻: <http://fmn.cc/X9HPTM>

<http://fmn.cc/XUin59>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余敏 28 日说,2008 年以来,重庆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人数比前 5 年上升三成多,共查办职务犯罪 4804 人,其中厅级干部 60 人、处级干部 852 人。2012 年共查办职务犯罪 878 人,其中,处级以上干部 157 人、涉案金额 1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461 人。

新闻: <http://fmn.cc/XUiz4x>

31 日事件中至今未露面且受到关注的赵红霞，被指出已经被以敲诈罪逮捕，同时也聘请了律师，律师称赵红霞表示参与这一事件是被老板肖烨所骗，认为当时自己太单纯。同时涉案的还有 2 名女性，一名被监视居住，一人则被取保候审，还有消息称，参与拍摄不雅视频的女性人数，可能不止上述三人。

新闻：<http://fmn.cc/VoPcHi>

<http://fmn.cc/VoJZPA>

重庆纪委 31 日表示案件有三个方面的进展，“一是初步查明雷政富涉嫌巨额受贿和其他严重经济问题，将于近日将此案移送司法机关；二是发现一个进行敲诈勒索团伙的线索，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已批准逮捕肖烨、许社卿等主要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对另外数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三是发现多名党政干部和国有企业负责人违纪情况并予以免职，下一步继续深入调查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新闻：<http://fmn.cc/X9u3QZ>

“房姐”等拥有大量住房人士

日来，陕西神木“房姐”事件引起陕西、山西、北京三地有关部门和公安部、最高检等部门的介入，“房姐”被曝光的房产已达 12 套。截至 25 日，神木警方及多家媒体的记者均无法联系上“房姐”龚爱爱本人。神木有关部门透露，警方已将龚爱爱的弟弟带走协助调查。

新闻：<http://fmn.cc/14isfMk>

北京警方 1 月 31 日表示，发现龚爱爱在北京拥有 41 套房产，共计 9666.6 平方米，还有奥迪轿车一辆。北京警方已经依法对龚爱爱的 10 套房产和奥迪轿车进行查封。龚爱爱大量的房产引发了网络热议。

新闻: <http://fmn.cc/WzHYn1>

巧合的是，在事件引发最高关注度的时候，1 月 23 日，神木县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政治教导员张某被发现死亡，警方初步判断其为服毒自杀，与“房姐”事件无关。目前榆林市公安局派人员在神木调查张某自杀原因。不过却有消息称该警察知道煤矿上的好多事情，也知道一些与办户口有关的事情，可能是他杀。

新闻: <http://fmn.cc/WzN4Qb>

<http://fmn.cc/SWZiCi>

近日山西运城市纪委干部张彦被揭发，她有两个分别落在北京和山西的户口，其身为前运城财政局局长的公公在各地拥有十余处房产。随后山西表示“房媳”情况属实，纪委正式立案。

新闻: <http://fmn.cc/WzNk1F>

<http://fmn.cc/WzN6HT>

随后北京警方称“房媳”的北京户口系投资买房获得，并不违规，不过媒体调查指出，张彦的丈夫、夏县公安局局长孙红军 2011 年因滥用职权、动用技侦设备调查举报人，被运城纪委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调离局长岗位。孙红军的父亲孙太平，还曾因给孙太平私改档案年龄，违反规定给儿子孙红军办录警手续，严重违反组织人事纪律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决定。

新闻: <http://fmn.cc/WzNCFS>

本周其他重点新闻

1 月 28 日，环球时报英文版《Global Times》的消息称，据接近国家最高司法机关的人士透露，薄熙来案可能要在三月举行的两会之后才开审。该消息人士还称，开审的日企和地点都会提前公布，现在没必要猜测，同时案情复杂，该案可能持续审理 10 天。

新闻：<http://fmn.cc/WzLT3a>

<http://fmn.cc/Vx7Sww>

1 月 30 日，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公开审理朱宝生、沈亚威、徐健捷等 14 人分别涉嫌犯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案。公诉机关指控：2012 年 7 月 28 日上午，部分群众因反对一项达标水排海工程而集聚时，被告人借机滋事，冲击、打砸国家机关办公大楼，造成财产损失、民警受伤等恶劣后果。

新闻：<http://fmn.cc/Vp2umV>

<http://fmn.cc/V6cUd3>

黑龙江伊春市一名上访女子被当地政府关在废弃太平间内长达 3 年，双腿瘫痪，还被人 24 小时轮流监视。该女子的儿子被信访办弄丢，丈夫身在精神病院。而官方当天回应此事时说，这是对信访人员的“人文关怀”。

新闻：<http://fmn.cc/WzM4vm>

根据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22 日的消息，中国维权律师高智晟的家人本月得以获准对他进行探访，不过家人在见面中没有被允许提问，探望的目的是为了证明高智晟还活着。

新闻：<http://fmn.cc/X9HOiH>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2013 年 1 月 31 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罗让贡求、罗让才让故意杀人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罗让贡求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罗让才让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新闻：<http://fmn.cc/VwVPMU>

1 月 28 日下午 4 时许，广州康王南路岭南派出所水蛇村旁发生地陷，两栋两层高的房屋倒塌，塌方面积约 300 平方米。现康王南路、十三行路、人民桥和浆木栏路等事故附近全部封闭。事故地点旁边正是地铁六号线文化公园站施工现场。

新闻：<http://fmn.cc/XUjVw4>

1 月 27 日，香港记者协会就港府有关禁止公众查阅公司董事住址和整个身份证号码的条例发表一份联署，此次联署共有 1768 人参与，声明及联署人的名字刊登在了 28 日出刊的香港多份报纸上。人们一致要求政府不要提交落实有关限制信息自由条款的规例。香港记协表示，现行让公众查册的安排，是新闻界揭露政商界丑闻的有力工具，而个人资料私隐专员亦已确认，现行法例没有侵犯私隐。

新闻：<http://fmn.cc/XUjGkN>

一名被称作是雷锋式的企业家，为了当上湖南省人大代表，于是在省人大代表选举中以每票千元向 320 人贿选，共花费 32 万多元，结果却以 20 多票落选。事后他在网络上实名举报这一情况，湖南省表示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对此事全面调查。

新闻：<http://fmn.cc/WbZONx>

1 月 30 日，“无国界记者”发布了 2013 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榜，中国被指出新闻自由并没有得到改善，总体排名上升 1 位为 173 位，并与另外 9 个国家一起被列为了全世界最不尊重新闻自由的 10 个国家。

新闻：<http://fmn.cc/U0ShSM>

《纽约时报》1 月 31 日刊文称，他们网站自从报道领导人家族财产之后，在过去 4 个月遭受中国黑客持续攻击，这些黑客使用的手段可能来自军方，他们还盗取了记者的帐户。

新闻：<http://fmn.cc/14ydZ2m>

虽然拥有大学文凭，却无法找到理想的工作，只能不断更换工资很低的工作，这些人被称为高学历穷忙族。在如今的中国，这样的年轻人正在增加。在中国这些人被称为“蚁族”。这是一群未能分享经济高增长成果的“蚁族”。

新闻：<http://fmn.cc/10Qw9MO>

[【返回目录】](#)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开始于 2009 年 8 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络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方式将现场放大至全球任何地方。我们希望提供独立、客观、理性的观点和论述，并关注被主流媒体忽略的议题和讨论。目前已举办二十三场讨论，嘉宾有艾未未、长平、陈冠中、贺卫方、胡泳、梁文道、欧宁、潘毅、叶荫聪、周保松、许宝强等。2011 年 6 月开始，为了丰富论坛的主题，我们在固有论坛的基础上开始一个 Co-ChinaX 系列，这些讨论、沙龙由 Co-China 同一些友好团体合作举办，试图将更多有价值的讨论呈现于网络。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pdf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mobi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epub 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也欢迎大家转发分享。

若希望加入“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的志愿者团队，请点击[这里](#)申请。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论坛 twitter：[Co-China 论坛](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

论坛新浪微博：[1510 周刊](http://weibo.com/1510weekly)（<http://weibo.com/1510weekly>）

编辑：[姚梧雨童](#)、[毕然](#)

校订：[黄海](#)

主编：[方可成](#)

配图：[肖承捷](#)、[王添裕](#)

技术支持：[毛向辉](#)、[舒欣](#)

出品人：[杜婷](#)

版权声明：1510 电子周刊所选文章版权均归原作者所有，所有使用都请与原作者联系。